



历史沿革
LISHI YANGE



西南大学记忆

名师风采

居功至伟的农学家李世俊



校史校情

关怀教诲永不忘

——纪念诗人方敬同志诞辰100周年

高考与我命运的改变

校友天地

“我俩唱一首歌”

——吴明珠院士谈丈夫杨其祐校友

影像记忆

候光炯到川农讲学与考察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2014年第1期
(总第22期)

(注：2008年12月，西南大学档案馆经广泛查阅资料，修订并完善了西南大学发展沿革图)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部分师生合影（1946年）¹

¹本图片由朱渝生老师提供。



白贵元书法¹

¹白贵元，1950年11月生，西南大学教师，师从徐无闻、郑思虞、秦效侃等。近年来发表、入书、参展、刻碑、被报道收藏的书作书论计百余件，其书法多雅气、灵气、儒学气，特别是中山王器字的造诣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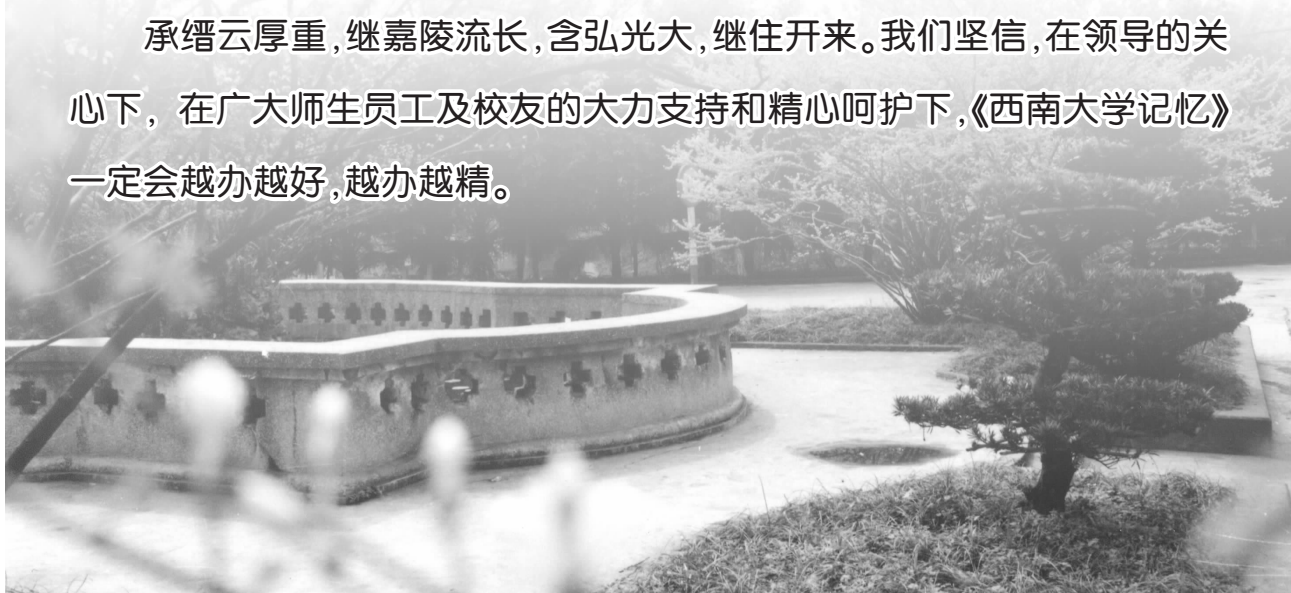
刊首语

□文/张晓华

寒来暑往,转眼间《西南大学记忆》已走过五年的历程,这其中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因疏漏造成的遗憾,更有对办刊不易的深切体会,同时也更觉今后肩负责任的重大。

五年来,我们恪守“重拾记忆,再现历史”的宗旨,去寻找那些平凡的感动,去记录那些曾经的难忘,为学校留下珍贵的回忆。但是百年的沧桑沉浮,百年的深厚积淀,有太多的人值得我们铭记,有太多的过往值得我们追忆,有太多的精神值得我们传承,作为学校记忆的守护者,我们任重而道远。

承缙云厚重,继嘉陵流长,含弘光大,继往开来。我们坚信,在领导的关心下,在广大师生员工及校友的大力支持和精心呵护下,《西南大学记忆》一定会越办越好,越办越精。



西南大学记忆

2014年第1期(总第22期)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顾问：张跃光 李明 靳玉乐
李兰 徐仲林

刊名题字：袁隆平

主编：黄敏

执行主编：张晓华

编委：郭兰 刘润

编辑：范韵杰 周凤 郭江红
李梦露 姚楠 蒋云燕

美编：刘润

校训：



目

刊首语..... 张晓华

名师风采

4 居功至伟的农学家李世俊 张晓华

档案拾遗

9 西南师范学院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张晓华

校史校情

14 轻轻叩开方敬师的家门 张大成

17 岁岁花开一忆君
——纪念方敬先生百年诞辰 吕进

19 关怀教诲永不忘
——纪念诗人方敬同志诞辰 100 周年 江家骏

21 孙法理教授：笔耕不辍，润物无声 张晓华

25 十八学子勇闯海南 文婉 剑飞

28 民族大业同心铸 渝州岁月千秋美
——劳君展与家父的一段往事 朱渝生

34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 张春 封期川 封期平

36 小儿眼中的吴宓 邵培德

录

- 37 我的故居 李秉铎
40 高考与我命运的改变 谢德体
43 郭沫若手稿今何在 邓 力

校友天地

- 44 “我俩唱一首歌”

——吴明珠院士谈丈夫杨其祐校友

影像记忆

- 46 侯光炯到川农讲学与考察 张晓华

西大掌故

- 51 “留法数学四老”中的段调元、郭坚白 邓 力

校史论坛

- 53 论校史档案管理的价值所在 王 玲
56 西南大学关于征集校史资料和实物的通知

封面人物 李世俊

封面二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部分师生合影(1946年)

封面三 白贵元书法作品

封底 西南大学历史沿革图

Memory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让我们共同书写记忆,为
西南大学创造希望与奇迹!

本刊地址: 重庆·北碚
西南大学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联系电话: 023-68250107
13436041609

校史馆参观预约电话:
023-68250107

投稿邮箱: xdjy2009@126.com

邮 编: 400715

照 排: 重庆新综艺图文广告

记忆:



居功至伟的农学家李世俊

□文/张晓华

编者按：西南农学院的党委书记和院长李世俊，是现代农垦事业的先驱者和实践家。他曾是北平大学的高材生，1937年投奔延安，在发展陕甘宁棉花生产和开辟南泥湾中做出过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国家农业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发展农业教育等方面，均有卓越贡献。



李世俊¹

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

李世俊(1901-1962)，字子义，1901年9月生于山西省万荣县薛店村。

1925年，李世俊考入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就成为各种新文化和新思想的策源地，各大学校园的政治气氛比较浓厚。李

世俊身在其中，不能不受熏陶。读大学一年级时，李世俊就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崇尚“革命救国”的思想，主张走苏俄道路、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并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政治活动。1927年，奉系军阀在北京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仅如此，反动军警还突然包围北平大学农学院，李世俊、余其心、张蜀樵等被捕入狱。李世俊等人在侦缉处关押12天后才被学校营救出来。由于积极参加革命政治活动，李世俊直到1932年才大学毕业。

毕业后，李世俊即投身于屯垦事业，在包头晋绥军屯垦办事处任科长，负责组织实施绥西的农业开发，取得卓越成绩。

特殊的党员

1937年夏，在阎锡山、王靖国的推荐下，李世俊到南京军政部从事军队屯垦工作。因“七七事变”李世俊报到后没到任工作，同年10月，李世俊带领江心、相里矩、高应明等农林科技人员投奔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1937年到1941年，李世俊先后在延安陕甘宁特区政府国民经济部任技正，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任技正、技术室主任、工业原料委员会主任等职。

¹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SX12-4。



李世俊(后中)与北平大学老同学侯光炯(后右)等人合影²

经刘少奇介绍,1938年,李世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没有预备期。当时党拟派他外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所以党籍在党内没有公开,而他也没有过组织生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党决定把李世俊留在延安进行生产建设工作,所以直到1941年李世俊在南泥湾工作时才被中央组织部批准党籍在党内公开,并正式过党的组织生活。而此前党的组织关系是同中央组织部直接发生关系的。

1952年,在“三反”“五反”后,中央决定帮助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李世俊服从中央农业部党组的安排,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成为民革的跨党党员,在农业部建立民革组织。

在陕甘宁边区发展植棉

李世俊曾负责筹建陕甘宁边区模范农场、筹办首届陕甘宁边区农产竞赛展览会及第一、二届工农业建设成就展览会。他由于具有丰富的农学知识和组织才能,不久便升任边区政府建设厅技术室主任。

1940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加紧经济封锁,企图削弱和困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边区军民为求生存自救,力争粮棉等主要物资自给。李世俊受党和政府委托,带领唐川、姚作农、丁景才等对沿黄河的延

川、延长、固临3县进行长达59天的考察,发现沿河地区光热资源比内地丰富,有利于棉花的生长,而且这些地方曾经种过棉花。在清末民初年间最盛时期的植棉面积约有8万亩,年产棉约60万斤左右。辛亥革命后,由于战争及灾害影响,植棉逐渐减少。后来又因洋布倾销,植棉无利,造成纺织业停顿。陕甘宁边区有150万军民,每年约需皮棉350万斤,以平均每亩产皮棉10斤计算,约需种棉35万亩,就可以基本解决边区军民用棉问题。这样看来,边区完全可以自己种棉花解决穿衣问题。于是,李世俊向边区政府提出在沿河三县种棉的报告。

边区政府批准李世俊的报告,并任命李世俊为工业原料委员会主任。为鼓励农民种棉花,他给农民算了一笔经济帐:如果每亩收10斤皮棉,每斤市价12-13元,则每亩收入为120-130元;而种粮食每亩收2斗谷子,每斗45元,每亩收入为90余元。虽然种棉比种粮费工,但收入比种粮高,所以也还划算。李世俊利用山西商人关系,从河东购进棉籽10多万斤,以低价卖给或秋后无息归还棉籽的形式贷给农户。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励农民种植棉花,如规定棉田3年内免征农业税或公粮,2斗棉籽可折1斗公粮;边区银行实行免利植棉贷款,春天照市价发放,秋天还棉花;组织唐川等人编写了《怎样种棉花》小册子和《棉花打杈挂图》印发下去供农民参考。1941年,边区棉田面积达到3.9万亩,以后逐年增加,1944年达29.5万亩,净产皮棉304.4万斤,约占边区需要量的2/3以上;到1946年,全边区棉田面积达到35.1万亩,实现了棉花自给。

南泥湾的组织开发者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朱德总司令调王震将军领导的359旅到南泥湾军垦屯田。李世俊作为当时延安有军垦经验的农业专家,积极参加了南泥湾的垦荒工作:他担任八路军总司令部南泥湾垦区主任、管

²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侯光炯院士-侯光炯专题(一)。

理处处长,兼任军委总农场场长,后又到教导二旅指导部队的生产工作,挑起了开发南泥湾的重担。

李世俊指导 359 旅将南泥湾建成模范屯田区,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发挥自己的专长,努力工作,从制定开发规划到具体实施,在土地分配、河道疏浚、稻田开发、造林护林、水土保持以及安置移民、积肥造肥、购买耕牛、农具、种子、开辟道路、建立市场等方面都做了具体安排。不到两年时间,359 旅和各生产单位开辟了 1.5 万余亩稻田和坡地,除生产自给之外,还向上级和政府交了任务和公粮。人迹罕见的烂泥洼变成粮食堆满仓、牛羊遍满山的陕北好江南,大大振奋了边区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3 年 1 月 11 日朱德总司令致书李世俊对他的成就给予赞扬,并希望他继续指导 359 旅和各机关生产队及农民完成新的任务。李世俊也没有辜负朱德总司令的期望,不断总结经验,加倍努力工作。1943 年 4 月 24 日,李世俊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怎样领导和执行南泥湾政策》的文章,系统地总结了南泥湾的土地分配、疏浚河道、治水节水、森林开发与保护、社会发展展望。

他刻苦努力的工作态度令 359 旅的干部十分尊敬。著名爱国将领、民主人士续范亭在《杂吟》中有“人民爱戴李主任,计划周详多辛苦。”王震将军称赞他为富有经验的农业专家。

1946 年 7 月,李世俊受中央组织部派遣带领一个 50 多人的干部队伍,离开延安前往华东解放区。李世俊在山东省政府实业厅任农业实验所所长,后改任农林科科长。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业务开展很难,机关工作人员大都被派出,做支援前线和土地改革的工作,而李世俊还参加了渤海地区的土改工作,投入农村反封建斗争,进一步充实了农村工作经验。

1948 年 5 月,李世俊由中央工委调到华北财委工作。当时设在河北平山西柏坡的中央工委华北财办要他先作冀中农村调查并参加解放区财贸会议,8 月正式调任石家庄华北农业试验场场长。这段时间,李世俊为迎接全国解放,建立新中国,在团结干部、培养人才、蓄积力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后来新中国发展农业科学事业准备了条件。

全力投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解放初期,李世俊曾担任过农业部计划司司长并先后在农业部植物病虫害防治司、农政总局、宣传总局等担任领导职务。1953 年 2 月,被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聘为科学院专门委员。

1951—1952 年,他多次带领专家前往河北黄骅和皖北等中华飞蝗的发源地,配合当地政府采取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方法消灭蝗虫。李世俊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力量,为把蝗虫彻底消灭在起源地而不至于扩大到其它地方,他大力支持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理化系研制生产第一代农药——六六,取得成功,为后来控制蝗虫及各主要害虫危害创造了条件。

当时的中国因受多年战乱影响百废待兴。兽疫流行,水旱病虫害经常发生,特别是水利失修,严重地阻碍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李世俊广泛启用和团结新老农业专家,架起一座联系党和知识分子的金桥。在李世俊的建议下,农业部聘请了几十位知名农业专家参加技术领导顾问工作。李世俊注意发挥他们的专长,为他们创造和提供工作条件,把他们吸收到国家农业建设迫切需要的岗位上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李世俊因其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受到广大专家的尊敬和信任,他们赞扬他农村工作的基础很扎实,坦荡无私,朴实无华,肝胆相照。这些专家经常深入实际,解决生产上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全力投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李世俊还注重对外交流活动。1953 年,李世俊参加中国科学院赴苏参观团参观访问,随后作为首席代表率中国植保代表团参加了在保加利亚召开的国际植保会议。1955 年,李世俊还赴印度参加了亚洲国家会议。

和西南农学院师生共渡难关

1957 年 10 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高等院校领导的指示,为加强对农业部直属的 8 所高等农业院校的领导,由周恩来总理任命,李世俊从农业部调往重庆任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院长,

肩负起为新中国培养人才的使命。1962年,李世俊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院长。在此期间,他还当选为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常务委员、四川省农学会理事、重庆市作物学会理事长。在西南农学院的日子里,李世俊与学校师生共同经历了“大跃进”的灾难和“三年困难时期”。李世俊一直保持和发扬延安时期的工作作风,刻苦自



1958年李世俊院长与师生一起参加生产劳动³

励,艰苦朴素,吃苦耐劳,以身作则,全力以赴、勤勤恳恳地工作。他平时总是穿粗布鞋、补丁衣,经常与师生一起到田间地头参加劳动,真正实现了与广大群众零距离的接触。虽然多年来他牙、耳、眼都有问题,同时患有失眠症,到后来还得了肺癌,但他始终带病坚持工作,与西南农学院师生共渡难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李世俊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响应“全民炼钢铁、炼钢又炼人”的号召,学院除派出了干部、学生351人外,还投资了人民币16000余元在黑石坪开办炼铁厂,炼出了一小坨毛铁作为报捷样品。后来李世俊在重庆市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对办这个厂的评价是“效果不大,没有收益”。李世俊着力整顿实习农场,亲自蹲点,帮助农场领导调整生产组织,撤换不称职的干部,明确生产责任,贯彻“多劳多得”原则,充分调动农场职工的积极性,从而大大减轻了教师和学生的劳动负担,保证了良好的教学秩序,教学质量也得到显着提高,为学院培养更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创造了条件。在自然灾害的年代

里,师生的口粮都是固定分配的,学生每月28斤粮,教师每月21斤,因为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口粮的标准反而比教师要高。有一次他和政治课教师欧阳世乾说到:“你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地做好宣传工作。粮食确实不够吃,国家有困难,给同学们讲清楚,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你们教师每月21斤粮不够吃,连我也不够吃。遇到灾害,要体谅国家的困难。”他身体力行,提倡多种瓜菜补充粮食不足。这对当时师生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起了一定的作用,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他从不争功诿过,对自己做错的事也勇于承担责任。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他与家人谈到自己工作中的一些失误,还表示了深深的内疚。如50年代初有一次陈云问及下年病虫害防治费用需要多少钱?他随口说,需要5000万。这在当时来讲是一笔较大的数目,后来中央如数拨下这笔款。但这笔款分发到各省后,有的省份并未专款专用,而是挪作他用,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他对自己没有组织发放好这笔病虫害防治款,甚感痛心。

李世俊重视人才,重视培养和爱护干部。学校农场领导和工人关心他的身体健康,趁他不在家时送去一只公鸡,他回家知道后把鸡送给了园艺系老教授董时厚。他还经常教育青年人,如何认识和分析形势,如何抓住问题实质和主要矛盾,按照事物发展规律办事,发动和依靠群众力量去完成任务。他特别强调发挥人的积极因素,对不同层次的知识分子,采取不同方法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西南农学院有一位教授,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长期存有抵触情绪,李世俊便推心置腹地和那位教授谈心。后来那位教授说:“李院长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口服心服,他语重如山,使我终生难忘。”

李世俊特别关心爱护他人,所有接触过他或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无不感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学校有一辆波兰“华沙”小轿车作为公务用车,李世俊在路上碰到学校的教职工都会叫他们上车。而且每次坐车到重庆市开会,李世俊都主动问有没有搭车进城的。李世俊还主动关心职工的婚姻家庭问题。此外,他尤为关心农场工人的生活,教导农场工

³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SX12-1。



召开系一级干部研究教学实验农场的规划问题
(中为李世俊)⁴

人以场为家。他经常与工人举行座谈会,后来甚至到农场与工人同吃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学生也是关爱有加——困难时期,为了使学生吃饱吃好,他亲自住在学生厨房,与厨房工人共同研究学生的吃饭问题。虽然住在学生食堂,他却从来不吃食堂的饭菜。他说“我在学生食堂看着香喷喷的饭菜,不能吃,也不该吃。我有我的口粮。”

李世俊长期以来坚持学习革命理论和科学技术。他刻苦学习的精神是有口皆碑的,而他也可以说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他总是争分夺秒,孜孜不倦地学习,见缝插针,只要有空就看书,看报,看文件。1961年10月,李世俊被确诊患上肺癌。在动大手术前两小时他还在泰然自若地钻研《资本论》,连

医生也感到惊讶。

李世俊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也令人感动。1961年李世俊到学校农场检查早情,得知农场工人早上5点钟就到田间出工后,他也早上5点就到田间检查工作,令农场工人十分感动。在住院治疗期间,他仍念念不忘学院的教学工作、生产情况和全院师生员工的生活情况。1962年7月,得到医院许可后他回学院休息一个星期,在这短短7天中,他不听劝告,每天都要和学院其他领导研究问题,还亲自到农场和农机厂指导生产,就连返回医院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召集农学系全体教师开会,研究布置工作,师生们看到他消瘦的样子、艰难的步伐,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1962年11月24日,李世俊于重庆逝世,享年61岁。学校在大礼堂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会场四周摆满了花圈、挽联。学校评价他:“有批评有鼓励,抓工作既全面又重点,是严师又是良友。”一个叫唐泽厚的学生在追悼挽联上写道:“忠贞勤劳为革命,心直口快一老人;亲切关照慈母意,严格要求长者心。”

李世俊在任虽然只有短短5年时间,却与学校广大师生建立了无比深厚的感情。时至今日,许多老同志仍然对李世俊念念不忘,铭记于心。

(编辑 范韵杰)

⁴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2010-2011-SX19-3。

西南师范学院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文/张晓华

编者按：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条件，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新解放地区的农村广泛开展。西南师范学院师生员工以满腔的政治热情，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进行自我教育，提高政治觉悟。

1.1950年底，西南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按照川东行署和北碚区的部署，学院动员组织了教育、国文、外语、史地、数学、理化6个系的31名学生参加第一期土地改革。

西南师范学院第一期参加土地改革学生人数统计表（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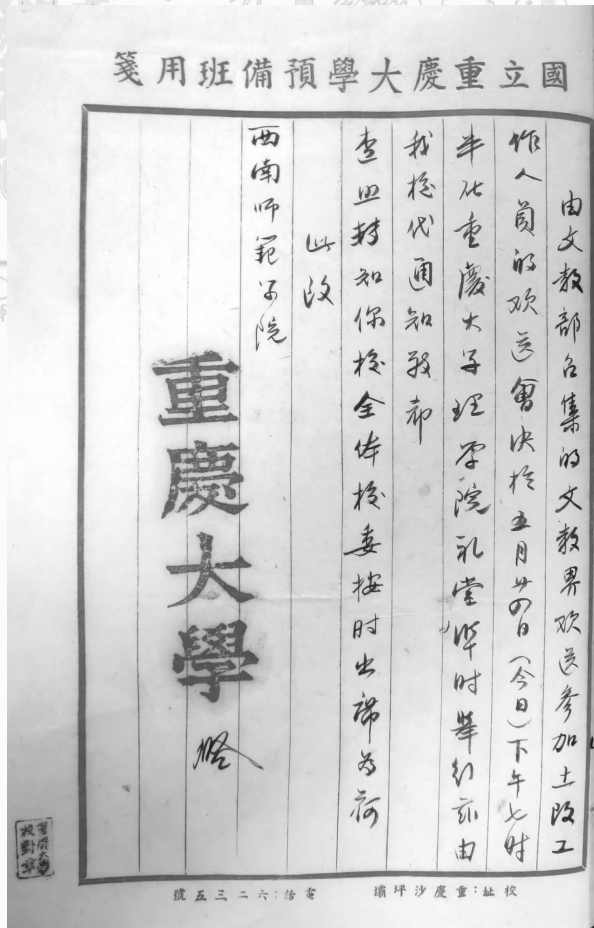
类别	人数	教育系				国文系				外语系				史地系				数学系				理化系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总计	31	4	18	5	15	2	10	3	4	1	1	2		10	1	1	7	1	1							1	1		
地天	11		1	8	2	5	1	3	1	1								5		4	1								
中农	4			4				2						2			2												
富农	1			1				1																					
不明阶级	6		2	1	2	2			2					3	1	1	1									1	1		
工人	2			2			2																						
贫农	2		1	1		1																		1	1				
其他	1		1	2	2		2	3	1	2																			
备注																													

1950年1月5日製

参加第一期土地改革学生人数统计表¹

¹ 本文所有档案均出自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1-XZ-56。

2.1951年,学院又派出教育、国文、外语和史地等4个系的61名四年级学生参加了第二期土地改革。



请全体校委出席欢送会的通知

西南師範學院展期(第二期)參加土改學生人數統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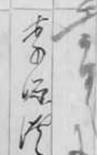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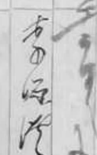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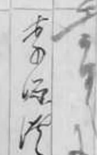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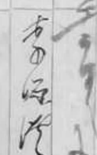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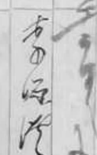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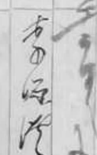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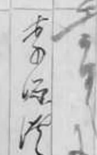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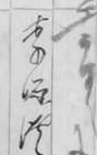
人數 級分	系別 年級	總計	教 育 系 四 年 級	國 文 系 四 年 級	外 語 系 四 年 級	史 地 系 四 年 級
總計		61	21	21	11	15
地	文	41	13	13	8	7
中	農	4	3	1		
當	農	2		2	1	
小	農 展 階 級	3	4	2	2	
自	由 職 業	3	1	1		1
職	員	4		1		3
商		2				2
其	他	2		1		1
備	註					

1952年1月5日製

参加第二期土地改革学生人数统计表

3.1951年5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通知西南师范学院教育、国文、外语、史地、保育、音乐等系的二、三、四年级学生 276人参加西南区的第三期土地改革。根据川东行署文教厅和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安排,于1952年元月下旬去四川简阳各乡参加土地改革。

西南师范学院 稿院學範師南西

主任委員  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		機送	文	文	文
		機送	文	文	文
事由 本院教育、史地、國文、外語、保育、音樂等系二、三、四年級學生 276 人，請由參加土改。又七條兼任教員，由教部核辦。		文	文	文	文
核辦 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		文	文	文	文
主任委員 		文	文	文	文
秘書長 		文	文	文	文
總務長 		文	文	文	文
教務長 		文	文	文	文
生活輔導委員會 		文	文	文	文
文書組主任 		文	文	文	文
稿 		文	文	文	文
稿目：教社二十 1797 號		文	文	文	文
發文 字第 1797 號		文	文	文	文
收文 字第 1797 號		文	文	文	文
年 一九五二年 十二月 二十二日 時撥稿		文	文	文	文
公曆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廿二日		文	文	文	文
核會 蓋 		文	文	文	文
核准 		文	文	文	文
全銜謝〇〇		文	文	文	文
公文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日		文	文	文	文

1952-021303, 50/95

关于学生请求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征求意见的报告

55

西南師範學院院務委員會并轉贈學生會。我
本院贈學生276人於元月二十日上午離校。下午三時乘成
渝路火車離渝。三時五十分到重慶。二月一日
正午由內江乘汽車。下午七時前到重慶。沿途
沿途同學有少數暈車。嘔吐的。經服食一心丹
等簡便藥品均已痊癒。現在簡陽縣有因
土改的多項問題。定於十日到重慶。到工作崗
位去實地工作。

我們自重慶出發時原有重慶大西師藝專
三校師生共50人。因內江土地改革工作。因各
團到內江後重慶大師到仁壽縣。西師與藝專
師生到簡陽縣。我們的宿食等問題。地方
委照顧得很好。可以說。你們。我們。大家都
有把土改工作搞好的決心。不。孤負。領導上
對我們的期望。

你們還有暇。請原學校。說。我們
致謝

吳德江 二月九日

以後川南土地改革工作團(重慶)部設於龍泉寺

函告學生參加土地改革沿途情況

西南師範學院參加

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填報

教員	職員	工友	未動員	生				
				助	金	音		
2			45	179	31	10	7	4

參加第三期土地改革學生人數統計表

4.此外,学院还有9名教师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而且学院还组织了教师土改参观团,分赴川东各地参观,以加深对封建土地制度落后性和残酷性的认识。

46

西南師範學院各系科教員參加及參觀土地改革工作人數統計表

系科類別	參加							參觀				備	
	總計	小教系	外文系	史地系	理化系	政治系	教研室	小教系	教育系	史地系	理化系		音樂系
總計	18	9	1	1	3	1	2	9	5	1	1	1	1
小資產階級	3	1	1					2	1				1
地	6	3		1		1		3	1		1	1	
中	3	3			2		1						
文教人員	3	1			1			2	2				
公教人員	1	1											1
商兼地	1							1	1				
小土地出租	1							1					

1952年1月5日填報

各系科教員參加及參觀土地改革工作人數統計表

土地改革是摧毀封建主義經濟基礎的偉大變革。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師生們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不懼農村生活艱苦、工作艱巨,日以繼夜地完成了各項任務。同時也深入了解了農村的階級關係和社會關係,熟悉了農業生產過程,傳播了農業生產技術。

(編輯 郭蘭)

轻轻叩开方敬师的家门

□文/张大成

编者按：方敬(1914-1996)是我国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和教育家，曾长期在我校任教并担任学校领导干部，同时兼任重庆市文联主席。2014年4月26日是方敬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本刊特刊发《轻轻叩开方敬师的家门》《岁岁花开一忆君》《关怀教诲永不忘》三篇文章，以缅怀先生为中国尤其是重庆文化教育事业及新诗发展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弘扬和传承先生的学人品格和教育思想。

著名诗人、散文家方敬教授于1996年3月17日去世，转眼已14年多了。作为学生，岁月之波却未冲淡记忆——当年我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中文系读书和工作后聆听恩师教诲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更加清晰温馨。

母校坐落在青翠的缙云山麓、嘉陵江上的美丽拐弯处，我从1956年至1960年就读于此。方敬师当时任教务长，虽未直接授课，却是一位给了我终生教益的恩师。

我一进校就听高年级同学说方敬师是万县人，北大外语系毕业，30年代著名诗人，抗战时期与何其芳、卞之琳一起办刊写诗，文学成就很高。我当时18岁，因为高中担任学生文学社社长，考大学的作文就写的诗，正是为诗狂的年龄，所以得知同为川人的著名诗人方敬师就在身边，欣喜之余还倍感亲切，十分心仪神往。

第一次见到方敬师是在1956年冬天的一个周末晚上，地点在第一教学楼一楼的教室。1957年鸣放、反右之前，西师学术空气相当浓厚，文艺创作活跃，出有院报、《西师文艺》（后改为《桃园》，由郭沫若题写刊名并赐诗《桃园花盛开》在该刊首期发表，方敬任指导老师）等报刊，每到周末常安排有各种学术活动。那晚是请方敬师和青年作家榴红谈创作。晚饭后，我早早就坐在教室里等着了。几盏大日光灯管把教室照得通亮，同学们陆续来到，教室挤得满满的，寒气一扫而光。当方敬师和脸蛋红红十分年轻的榴

红由组织者陪同走进教室，全场掌声雷动。方敬师那时40多岁，中式对襟短袄，宽围巾，遮阳便帽，浓眉宽额，络腮胡刮得青乎乎的，镜片后的目光睿智深邃，讲话却轻声细语，机智幽默。他讲了新诗的产生、发展、现状和前途，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他举例说抗战时期，有位躲在象牙塔里的大学生写失恋就像挤公共汽车，一辆没挤上，又一辆没挤上，痛苦的眼泪呀就像那无尽的删节号……在全场哄笑声中，方敬师严肃地总结说：“人品决定诗品，人品高则诗品高，思想境界高则诗歌境界高。文学是为人生的艺术，不能玩文学，不能附庸风雅。诗歌首先是战斗的，不能脱离时代和人民，必须反映火热的时代，喊出人民的心声，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不能像那个脱离时代的大学生‘为赋新诗强说愁’，无病呻吟……”

大学时我性格内向腼腆，有时和女同学说话都脸红。可有件事我却做得相当大胆，那就是独个儿两闯教务处、叩开方敬师的家门并和他促膝谈诗，结下永远难忘的诗缘。那是1960年6月我们大四学生下中学“保高三”前夕的一天下午，我挑选4年来较为满意的习作和已经发表的作品共60多首诗自订成册，题名为《向阳集》，并附上一封写给“敬爱的方敬教务长”的短信，说我毕业在即，希望他在百忙中审阅我的习作并不吝赐教。我径直走进办公楼二楼的教务处，并未见到方敬师，只好把诗集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我当晚回寝室对照信的底稿，发现将信末“致

诚挚的敬礼”抄写成“致诚挚……”，即惴惴不安一夜。第二天下午我又跑到教务处，给方敬师送去一封纠错和致歉的短信，其中有“诗坛相会日，期以二十年”的话，有点不写出名堂不回来见老师的意思。不料这次到教务处，却有幸见到方敬师。他知道我就要下中学去了，略一思忖，即对我说：“我今天晚上赶着看完，你明天下午3点到我家来吧！”

翌日，我准时前往拜望方敬师。午后阳光灼人，没人走动，静得出奇。我刚刚轻叩正门，旁边耳房门却“吱呀”一声打开了，方敬师撩开绿纱门帘热情地把我让进屋里。屋里陈设简朴，没有空调，没开风扇，一间床铺着细蔑凉席，凉席上缀着几处十分精致的小补丁。绿纱窗下一张书案，窗外竹影摇曳，绿叶婆婆……一个著名诗人、学院领导就这样和一个普通的爱诗的青年学生，促膝相坐于西窗下，共话新诗了。

这次谈话约2小时，开始他是翻着诗集逐着点评，后来干脆把本子合上信马由缰，讲起生活、创作、社会和人生来了。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背景下，他说：“你4年能写出这么一本不容易，总的来说健康向上、积极进取，有些诗还真有诗味，看得出来你是勤奋的，也是有毅力的。写诗是一辈子的事业，是要经历许多挫折和考验的，解放前有些革命诗人还为写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现在年轻，要有长期坚持、经受挫折的思想准备。你马上就要毕业走向



方敬与女儿合影(1964年冬)¹

社会了，建议你首先要教好书做一名合格的中学教师，千万不要脱离实际工作和人民大众，最好是做个业余诗人，不要做专业诗人。记住：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坚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政治上不能犯错误。”临别，他指着我信中的“诗坛相会日，期以二十年”幽默地说：“你也太谦虚了吧！诗坛相会哪里需要那么久呢，你随时可以来找我嘛！小伙子，俗话说走路不怕慢只怕站，继续赶路吧！永远不要停步。”这次谈话，方敬师不仅教给我读诗写诗的基本方法，授之以鱼，而且指引我如何做人，授之以渔，受益终生。

西师毕业后，我和方敬师就天各一方了。其间经历了“文革”10年动乱，正应验了方敬师提醒过我的：要经住挫折和考验。1966年6月初，我的这本完全是歌颂性习作集连同写给方敬师的信都被抄走并遭到批判……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把我从执教18年的中专校直接调入一家党报担任文学编辑。每次见到母校来人我就打听方敬师的情况，得知他在“文革”中被批斗得厉害，但他拒理抗争，十分坚强。

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约请我和《星星》诗刊主编白航编选《当代四川山水诗选》。虽然我和方敬师已24年没有见面，也没有联系，但心却是相通的。在出版社的支持下，我非常自信地给方敬师写了一封约稿信，请他为这部新诗选作序。几天后他就将一篇写得非常认真、很有见地的序言寄来。出版社很满意。书出版前夕，我将序送到《四川日报》，在1985年4月28日的副刊头条发表了，社会反响极好。该书于1985年7月正式出版，并于当年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中国书展”，好评如潮。

我和方敬师书信算是联系上了，但“诗坛相会日”却是在1988年5月的江油太白诗会上，时隔28年了。方敬师是老前辈，晚会上还和孙静轩等一起登台吟诗，与会诗人们都十分敬重他。诗会结束，我有幸陪方敬师一道坐火车从江油回成都。劫后重逢的师生俩，五味杂陈，方敬师老了不少，我也人到中年，一路上畅谈几个小时，直到拢成都才分手。摆谈涉及当时诗界热烈争论的“朦胧诗”问题。这位精通外国

¹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文学的老诗人态度鲜明地说：“朦胧和晦涩是两个概念，有些朦胧诗还是写得很美很不错的。可现在所说的朦胧诗根本就读不懂，让人莫名其妙，这是食古不化、食洋不化！中国新诗应该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对外国文学应该‘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对我们自己的东西则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实现中西合璧。归根结底，中国新诗就是要让更多的中国人懂，更多的中国人喜欢，并不是只写给几个诗人或小圈子的人看。不然写出来有什么意思呢！”联系到方敬师早年的诗集《雨景》《声音》《行吟的歌》《受难者的短曲》，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的《拾穗集》《花的种子》《飞鸟的影子》等诗集，抒情与哲理融合，优美深沉，写法则中西合璧，很受大众喜爱；再看关于中国新诗走向问题，我觉得他的主张和创作实践，其实已作了回答。

1988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又一次见到方敬师。这次相聚地点是成都。当时方敬师社会活动很多，担任着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省作协顾问、《银河系》诗刊主编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副总主编，经常来成都开会。这次一见而，他就对我说：“大成哪，看到报刊上称你为‘记者诗人’‘乡情诗人’，说你的诗是‘壮美深沉的时代回声’，我很高兴，就想见你一下。你可千万不能自满哟，不要停步，继续赶路吧！”临别时，他把早已题好字的大作《拾穗

集》送我，印刷错漏处均一一改正。那种严谨认真继续无声地教育着我。

我最后一次见到方敬师是1989年5月，回母校参加中国散文与旅游文学研讨会之际。当时我的第三本诗集《巴蜀诗旅》正放在西南师大出版社，他便让出席会议的出版社同志给予关照。在他的直接推动下，拙著于1993年9月出版，不久获得成都市第三届金芙蓉文学奖（政府奖）。

那次会议于5月9日结束。中午会餐和合影后，我和许子清教授等几位西师老同学一起送方敬师回家休息，这才第一次见到了当年就久闻其名的何其蕙（何其芳胞妹）师母——此时已是白发皤然了。

恩师方敬一生执教、写诗，育人无数，佳作无数，诗品人品堪称楷模。他在晚年赶上改革开放，创作勤奋，诗情勃发。他是带着累累硕果走的。贾曼诗云“最后的方敬不是后现代”而是“一笔勾出人生的秋收”，王尔碑说他是“一首无字的诗/站在秋日的讲台上——/清贫、高贵、严厉、慈祥”，杨山赞他是“人类的良心”。我不是方敬师出色的学生，他却是我一生敬重的师长。方敬师并没有离开我们。每当我在人生跋涉的路上遇难退缩或疲惫偷懒时，方敬师那瘦削而坚毅的面庞总出现在眼前，那亲切的鼓励和鞭策就会在耳边震响：“继续赶路，永不停步！”

（本文转自《文史杂志》2011年第1期）

岁岁花开一忆君

——纪念方敬先生百年诞辰

□文/吕进

我在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念书的时候，方敬是学校领导，是学生们仰望的名满全国的诗人，我当然无缘和他直接交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在外语系高年级担任主讲教师，但我自幼喜欢诗歌，从小学时代就开始发表诗歌，觉得外语专业非我最爱，就在系主任赵维藩教授的支持下，和诗人邹绛等在外语系组建了汉语教研室，开始搞新诗研究。慢慢地，由于诗的关系，和方敬熟悉起来了，而且交往非常密切。他常常到我家里来谈诗，那时我是一个小讲师，家里别无长物，他这个校长往往就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一坐就是半天。那个时代，没有手机，学校有事也找不到他，他在我这里真是“躲进小楼成一统”，非常惬意啊。对于这位常客，我儿子亲热地叫他“方爷爷”，我太太尊敬地叫他“方院长”。八十年代，重庆市文联许多会在西师都常常是邀请他这位文联主席和我去，于是我就常常跟着他，坐他的车。每次回到学校，车停在通往他家的高高的台阶前时，他都会长长舒一口气：“啊，又回来了！”我向他道谢时，他总是说：“哎，这是学校的车，为啥谢谢我呀！”1987年，我的太太动了大手术，以后的近十年间，直到他弥留之际，见面一定会问：“太太怎么样？”

1985年，学校准备申报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点。那个时候全国的硕士点很少，要由北京审批。报点需要三个导师，学校以外语系汉语教研室为申报单位，以方敬教授、邹绛副教授和我做导师。我虽是汉语教研室主任，但是讲师不能申报啊，学校就给我想了个身份：“待批副教授”。我从学科目录看见有一个“中国各体文学”，就建议改报这个学科，这样的覆盖面大些，对学校的发展有利，学校采纳了我的意见。可能是看方敬的面子吧，学位点批下来了，方敬找邹绛和我去，说：“我是写诗的，邹绛，你是翻译诗的，这个研究生具体由吕进带。”一次，学校召集导师

会议，当然不便通知他，邹绛开会回来，去他家汇报。他见我并没有和邹绛一起去他家，就问：“吕进去开会没有？”邹绛说：“他们没有通知吕进，说他只是一个讲师，不够格。”方敬闻言大怒，那天是因为肚子疼，他在家休息，立即带病去到办公大楼。那个时候的研究生工作不多，是方敬分管的科研处负责，方敬在科研处大发雷霆：“你们不要吕进开会，好吧，以后研究生的事就不要找我了，我不知道！”“你们要向吕进道歉！”当天，科研处长两次登门向我道歉，我才知道有这件事。我忙说，行了，别道歉了，以后注意就是了。

1986年，四川省人事厅决定在全省高校搞优秀人才破格提拔职称的试点，在四川大学和西南师范大学各确定一个人选，在西师不幸选中的是我。本来，在半年前，外语系就要把我报为副教授的，但我不愿意。我的人生哲学是：安静地读书，安静地做学问，不愿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于是我向系上提交了一份五个人的名单，我说，这几位水平和我八九不离十，要提就一起提吧，于是，此事也就暂时束之高阁了。谁知，半年后更升级了，要我当破格教授的典型。我不干，学校反复做工作，什么“要顾全大局啊”，“要为学校着想啊”，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人事厅提出，要在校内外各找一个级别最高的同行教授鉴定。他们找的校外专家是山东大学教授高兰，知名诗人，一级教授。高兰接待人事厅的来人，听说什么事后，第一句话就是：“吕进还不是教授呀？我把他的书列进我的研究生的必读书目的。”人事厅的人后来告诉我，当时一听这话，心里就有把握了。校内就找方敬，他是进了文学史的诗人，三级教授。不但是从讲师直升教授，而且是外语讲师提中文教授，这事当然就不会平静了，集中到一点：我是学外语的。方敬说，学外语的搞中文，算什么转行，本来就是一家嘛。钱钟书不是学外语的吗？冯至不是学外



方敬(右)在著名诗人卞之琳家中与卞之琳交谈(1984年3月)¹

语的吗?卞之琳不是学外语的吗?我现在还保留着方敬1986年写的那份鉴定书,满满一页,一字一字十分工整,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最后写道:“我为学校有这样的人才高兴。该同志已完全具备教授水平,建议破格晋升教授。”末尾署名是“同行教授方敬”。

1986年6月,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新诗研究所现在遍布中国高校,包括北京大学,但在当时这是中国的第一家,史无前例,有些人有意见,甚至反对给新诗研究所划拨科研经费。前年,北京大学在原新诗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仍由谢冕所长负责的诗歌研究院,特地请我与会,并代表全国新诗研究机构讲话,我还回顾到当年我们极其困难的处境。方敬却支持新诗研究所,用他的经验和智慧指导了新诗研究所的建设。他的有些意见,现在看来是多么精准。比如,在进人问题上,他坚决反对接纳不合适的人进来,后来的事情证明他的眼光是多么犀利啊。他是

1996年去世的,在1992年以前,一直都坚持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有些人和事,对于我们是诗歌史上的知识,对于方敬却是亲历亲见,他的博学、多闻和风趣,大大提高了答辩的层次。1992年以后,答辩席上没有了方敬,我每次都有怅然若失之感。

时间过得真快,今年4月是方敬先生百年诞辰了。这些年我有一些研究方敬的文字,比如《方敬的拾穗集》《他的诗神依然年轻——读〈拾穗集〉》《方敬:创作轨迹与艺术风格》分别发表在北京《诗刊》、成都《星星》诗刊和《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还为《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撰写了《方敬》专章。也在上海《文汇月刊》《重庆晨报》《重庆晚报》等报刊写过报告文学和散文《光的追求——诗人方敬素描》《难忘方敬》《深情一吻》等。所有这些文章已经分别收入《给新诗爱好者》(1984)、《吕进诗文选》(2009)和《岁月留痕》(2013)等书。

现在我也年过古稀了。我想到医院最后一次和方敬见面的情景。当时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病床的床单上还有头天输血的血迹。他非常疲惫,说话吃力,但是还在关心我太太的情况。他对我感慨说:“人生太短了,还有许多事没有做”,“比如,邹荻帆和邹绛有的事,我还没有写。”对人生的短暂,我自己现在也深有所感了。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趁还能工作的时候,尽量做事,像我的恩师方敬那样。

我想起清人王士禛的诗句:“江南红豆相思苦,岁岁花开一忆君。”是的,方敬是花开时节出生的,岁岁花开时,我都会想念他,永远,永远。

(本文转自重庆晚报2014年4月9日)

¹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关怀教诲永不忘

——纪念诗人方敬同志诞辰100周年

□文/江家骏

方敬是我国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和教育家。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1年初,我正在重庆大学外文系读大学二年级时。我学的是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当时,系主任周考成老师本想请方敬来教我们翻译课,可方敬因社会工作太多,婉言谢绝了。系主任要我们派代表亲自登门去请,于是作为班长的我便和同班的周纪兴一道前往磁器口西南师范学院方敬老师的家。记得我们到他家门前时,看见一位穿着当时很流行很常见的苏联花布做的连衣裙的中年女士,正提着一把喷壶在浇花。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就是方师母——何频伽女士,大家都喜欢亲切地叫她何大姐。我和纪兴进门后,方敬老师问明了我们的来意后便请我们坐下。他非常客气地对我们说由于重庆刚解放不久,他目前工作实在太忙,以致于不能去重庆大学给我们授课,有负同学们的厚望,对此他深表遗憾。我们回到学校后,向领导和同学们说明了方敬老师不能来的原因,大家深感遗憾。大概两天后,在外语系的公告栏上,我们见到了方敬老师写给我们的致歉信,写得十分工整,一丝不苟,字虽小但秀美。

从1952年开始,我国各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在这次调整中,重庆大学外文系的学生调到四川大学外文系,我们的老师一部分调到西南师范学院,一部分调到哈尔滨外专学俄语。1954年夏,我从四川大学外文系毕业,服从分配到内江二中和内江高中教了三年俄语。1957年我经原重庆大学的熊正伦教授推荐,被调到西南师范学院教英语,从事本行。从此方敬便一直是我的领导。特别是在我担任吴宓先生助手时,就是在方敬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学习进修英国文学的,我所写的作业和论文,每次都要呈交给他检查,这样一来,我和方敬见面的机会就很多。虽然我没有听过他的课,但我聆听他的教诲,远比一

般学生还要多得多。在业务学习上,我得到了他许多关怀和帮助,他实际上就是我的老师。

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陆游的英文作文,文中我把陆游填的《钗头凤》词中的“错!错!错!”和“莫!莫!莫!”英译为“Wrong! wrong! wrong!”和“*No more! no more! no more!*”,还受到了吴宓先生的称许。我同情陆游和其表妹唐婉在婚姻上的不幸,在文中写了这样一句话:“*I hate the cannibal feudal society!*”吴宓先生把他批改后的卷纸发还给我时,我发现在我这句话的卷纸边上,吴宓先生用红墨水钢笔写了这样两行字:“难道你的父亲也吃人吗?你的祖父也吃人吗?”我以为是“cannibal”这个词用得不对,便把卷纸拿去问吴宓先生,是否因我用词不当。他说我没有用错,是因为他最不喜欢听别人说“吃人的封建礼教”之类的话。当他听我说卷纸还要呈交方敬院长看时,他马上拿出一把小剪刀把他批的那两行字剪掉。我将卷纸呈交方院长时,如实地说明了情况,方院长听后心平气和地对我说:“只要你自己能知道他的看法不对就行了。”

1962年5月10日下午,方敬老师代表党委到吴宓老师住处向吴宓先生说明当时正在进行教改,中文系个别学生对他的“责评”“非党授意”,他特代表党委向吴宓先生“致歉慰问”,同时告诉吴宓先生党委已经同意,要吴宓先生“传授江家骏英国文学及比较文学”。吴宓先生在“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这几个字的下方还加了着重号。(见《吴宓日记续编》)

在我脱产师从吴宓进修期间,有一次我去方敬老师家呈交作业时,他正卧病在床。进屋后,他向我招手,示意我过去坐在他躺着的那张靠壁的小床沿上。在我们谈到吴宓先生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对于吴老师这样的老专家,我们应当看到他的进

校史校情

步。解放前夕,他曾打算投嘉陵江。解放初期,他最初态度有点消极,躺着不干;后来他愿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工作;今天他更是愿意为我们培养人才。你不是当他的助手吗?”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方敬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团结他们、关爱他们、鼓励他们和我们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实属难能可贵。

方敬做事一贯十分认真负责。仍记得1981年暑假,评审杭州大学蒋炳贤教授的研究生郑恩岳同学论文的事。郑恩岳论文的题目是:“A Survey of Fielding's Tom Jones”。方敬老师知道我对这部小说比较熟悉,因为我师从吴宓先生进修英国文学时,我的结业论文就是评这部小说。当年方敬在看了吴宓对我论文下的评语后,曾对我说:“吴老师对你的学习和你的论文评价都很高,他说你‘阅读广博,用力精勤’、‘勤勉好学,精力过人’,特别预言如你用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教外国文学,‘亦必成功’。你虽然得了‘优’,但一定不要自满,要更加谦虚谨慎,学无止境。”我能参与审评郑恩岳的论文,是方敬向蒋炳贤教授建议的。在我们草拟评语的时候,主要先由方敬老师提出意见,共同研究,最后再由方敬老师定夺,真是字斟句酌。那次和方敬老师一道评审论文,我真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方敬(左一)与家人在西师民主村15号合影(1976年夏)¹

方敬不仅爱读书,而且喜欢逛旧书店,他说在那里有可能买到价廉而绝版的难得的好书。那是1973年5月30日下午,我因事到他家去。我们谈到了英诗选集的版本,他问我有没有英国家喻户晓的、相当于我国《唐诗三百首》的《Golden Treasury》,我说有,他立即从他的书架上取来当年他在北京旧书店购得的一册极为难得的版本给我看。那确实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版本:赭红烫金硬壳精装,日本研究社出版的英文学丛书中的一册,书名《金玉集》。这套丛书由日本英语界最著名的学者冈仓由三郎和市河三喜主编,全书注释由冈仓由三郎(YOKAKURA)一人独立完成,非常详细,很有特色,昭和四年八月二十日印刷,特别的是这册书是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非卖品”的方式发行的。方敬老师对我说:“我借给你,你拿去和你的比较一下它们的注释。”我非常高兴地说“我三天后一定奉还。”下面就是我借书回来、抄录完该书部分注释后在笔记本上写下的两段话: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日夜自方敬同志处借得日本人冈仓由三郎所注之《金玉集》(或《金库诗选》)。三日来抄录其中之部分注释,余已有牛津版 Wheeler 注之该诗集,以及1912年 Ginn and Company 出版 W.P.Trent 及 John Erskine 合编之 Palgrave 原编 Golden Treasury。以上注释可补此二版本之不足,惜时间不允,未能全抄,憾甚!憾甚!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午后二时四十五分家骏志于北碚西师文化村五舍小屋。是日也,洪儿自江北参加讲故事归来。洪儿于三十一日午后一时离家,家中仅敏及我二人。因抄书,未上街买菜。敏吃饭无菜,于心甚觉不安。

(以上共摘抄了有关74首诗之注释)”

1983年夏,我在耶鲁大学英语系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后归来,随即到方敬老师家向他汇报我在美一年的学习情况。我说我刚到耶鲁,就受到张充和前辈的关怀,她给我送来碗筷,因为我是北大李赋宁老师介绍给她和她的先生傅汉思的。(下转第52页)

¹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孙法理教授：笔耕不辍，润物无声

□文/张晓华



孙法理¹

人物简介：

孙法理，1927年9月生，男，汉族，四川内江人，著名翻译家。历任重庆第八中学教师，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外语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孙法理于1927年出生在四川内江的一个英语教师家庭。孙法理在中江、名山、雅安、成都等地读完小学和中学。1944年考入因抗日战争迁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读外文系。1946年夏，学校复员迁回武昌珞珈山，他随校东下。由于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孙法理主要靠当时的战时学生生活“贷金”完成学业。

1948年，孙法理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成为范存忠、郭斌龢和景昌极门下的外国文学研究生。当时上的课有：语言学、戏剧、拉丁文等。语言学由范存忠先生上，范先生那时在外交部条约司兼职，那是份为国家利益抠字眼的工作，很要求语言水平。他讲课速度快，内容密集，孙法理记笔记很吃力，课后还得查资料补充。戏剧课由陈嘉先生上，

读的剧本是萧伯纳的《Candida》(陈瘦竹译作《康蒂姐》)，孙法理以前读过这剧本，感觉比较轻松。拉丁文由一个德国人教，他有个中国姓：白。此外，还有一位老师，指定他阅读文艺复兴时代的Erasmus的一本书，要求他做读书报告。那时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天上不断有飞机飞过，轰隆轰隆响个不停；不久，国民党溃败，逃往广东。孙法理担心南京要陷入战火，只好于1948年冬回到重庆。

1949年，孙法理开始在树人中学任教。1957年，他考入西南师范学院做吴宓教授的外国文学进修生(前一年还叫副博士研究生，1957年取消了副博士研究生的称谓)，上课不到一个月就被调到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孙法理从英语专业一年级教起，教了一辈子书。他知识面广，专业基础扎实，汉语和英语功底深厚，实践能力强，长期担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讲授过英语讲读、文学翻译、戏剧、莎士

¹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http://foreign.swu.edu.cn/html/56/2007/07-24/634.html>。本文其它图片由孙法理老师提供。

比亚等课。他教学认真负责,效果好,深受学生欢迎。1987年,他被聘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3年,孙法理曾随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调查访问小组到武汉、南京、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的大学访问、听课,了解各校教学与管理情况,对推动外语系教学与管理工 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1978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作为重庆市首批对外开放学校之一,西南师范学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逐渐活跃起来。1985年,孙法理作为西南师范学院校长代表团的翻译,同副校长钟章成(校长代表团团长)、党委书记张凤山和副校长洪范一起,先后访问了美国8个州、市的13所大学。代表团同美国高校负责人、专家、教授进行了会谈,同堪萨斯州威奇塔市的教友会大学和俄亥俄州提芬市的海德堡学院分别结成了“姐妹学校”,同哥伦比亚教育学院、田纳西州大学、海德堡学院、堪州教友会大学和西华盛顿大学之间签订了建立学生和老师交流、资料交流的协议。这次出国访问还为学校一批教师创造了出国进修的机会,并打开了对外交流的渠道,使学校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次出访中,孙法理翻译流利、迅速、准确,表现出高超的翻译技能,为代表团出访取得圆满成功做出了较大贡献,深受国内外人士称赞。

1986年,孙法理受美国堪萨斯州威奇塔市教友会大学之邀赴美讲学,主要讲授中国历史和语言,积极向外传播中国文化。1988年,美国圣约翰圣本斯大学学生来西南师范大学学习,亦由孙法理给他们讲授中国文学。孙法理搜集和选编了英文本的中国文学教材,从《诗经》《楚辞》《史记》、唐宋传奇一直讲到《红楼梦》,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阐述讲解。比如讲到合川钓鱼城是“上帝折鞭之处(where the scourge of God was broken)”时,他不仅在课堂上生动地讲述了蒙古的蒙哥大汗在那里被石炮轰击落马受伤后死去,使入侵阿拉伯半岛的元军撤退,从而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史实,而且组织了美国学生到钓鱼城去触碰文化,感悟历史。因为他授课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生们对他的课很感兴趣。在学习班结束后的欢送会上,按美国规定,由美国带队的关耐寒教授正式报告了学生的评价结果,学生对孙法理的评价为良好。

二

1985年访美期间,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圣约翰大学和圣本尼迪克学院让代表团的每个成员到学校书店去挑选一本书,作为礼物赠送。孙法理挑选了一部一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Riverside Shakespeare(滨河版《莎士比亚全集》,1974年版豪华版)。原意只是收藏,必要时查一查,退休后再慢慢读。没想到,回国后一浏览,却发现里面出现了一个他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剧本《两个高贵的亲戚》,这让对莎士比亚有一定研究的他大吃了一惊,引发了他的兴趣。

1947至1948年,孙法理在武汉大学外文系时曾读过莎士比亚课,授课老师是袁昌英教授。袁老师不但是五四时代的著名女作家,而且留学英国和法国,获得过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兼通中西文学,学养深厚。她的莎士比亚课采用的是英国学院派的教法,并不讲什么“量力性原则”,该怎么讲就怎么讲,旁征博引,十分自如。在她看来,大四的学生有了困难应该自己克服。开始时孙法理读得很吃力,后来找到了一些很管用的参考书(其中帮助最大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F. A. Lombard的莎士比亚戏剧原文注释评解本)才逐渐上了路。渐入佳境之后,孙法理对莎士比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但细读教材,而且自学了很多莎士比亚的作品和评论。他的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莎士比亚,名为Morbid Sons of Nature(《大自然的病态孩子》)。

这次在《莎士比亚全集》里见到这陌生的《两个高贵的亲戚》时,孙法理很惊讶,他决定静下心来细细地读一读。读过才发现,原来这是一部新确认的莎士比亚佚作(确切地讲是莎士比亚和弗莱彻两人的佚作)。他觉得这个剧本很值得注意,可又担心美国出版人标新立异,搞生意经,怕跟着闹笑话,于是决定持保留态度。好在1986年他又去了美国堪萨斯州威奇托市的教友会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文化,他就带着这问题去了,希望能在那里调查出个结果来。他在那里多次进大学图书馆查询,进市图书馆查询,找美国同行探讨,包括向学校的文学院院长Ray Nelson教授请教,却都没有得到能说服他的答案。现在回忆起来,原因也很简单:那时还是1986年,就连英美莎

学界的精英对这个问题也才刚刚获得较为一致的意见,一般的学者不知道并不奇怪。



WHEREAS,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today's world for the people of all nations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thoughts, and experiences, and

WHEREA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 the mutual benefits to be gained through friendly relations and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WHEREAS, Heidelberg College and the City of Tiffin are greatly honor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ost the visiting delegation from the Southwest-China Teachers' University,

NOW, THEREFORE, I, Thomas L. Yager, Mayor of the City of Tiffin, Ohio, do hereby extend the official greetings of our City and warm welcome from our citizens to

PROFESSOR SUN FALI

of the Southwest-China Teachers' University, and invite him to return again to visit with us in the future, just as we hope that someday we migh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his great Nation.



Done Under My Hand This
Twenty-Third Day of
September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Eighty-
Five.

Thomas L. Yager
Thomas L. Yager, Mayor
市长 T. L. Yager 签名

美国俄亥俄州提芬市对孙法理教授的欢迎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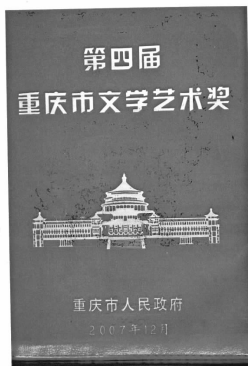
于是,他就自己钻研。滨河版《莎士比亚全集》是个很好的版本,有很具说服力的介绍和详尽的注释。他读了,并相当程度地被说服了,于是决定冒险把它翻译出来。译本被漓江出版社接受,准备出版,他又恰好有了向孙家琇先生请教的机会。孙先生是他在武汉大学时的老师,也是莎士比亚专家、中国莎士比亚学会副会长(会长是曹禺)。那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英美的莎士比亚研究界对这一问题已有了结论。孙家琇老师为孙法理的译本《两个高贵的亲戚》写了序言。令孙法理高兴的是,漓江出版社还为《两个高贵的亲戚》配绘了许多很精美的插图,此剧本刚出版又为成都的《峨眉》杂志创刊号所转载,几年后还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

与此同时,孙法理还继续对莎士比亚作品及佚作进行研究,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如《莎翁的“轮子”——从一个字看修辞格的翻译》(《中国翻译》1988年第3期),《好拭明珠还故主——“两个高贵

的亲戚”何以新入莎集?》(《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为政变者写下的挽歌》(《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爱德华三世”莎作真伪之辩》(《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12月),《新确认的莎作“爱德华三世”》(《燕山大学学报》创刊号2000年1月),《关于新确认的莎士比亚四部作品》(《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莎士比亚为“汤玛士·莫尔”增写的两个片段》(《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他的这些作品引起了出版界的注意,译林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向他约稿来了。译林出版社打算新出一部莎士比亚全集,他们使用了朱生豪先生的译本,但是朱先生是在日本占领时期的艰苦条件下翻译的,且英年早逝,没有来得及翻译历史剧、传奇剧和诗歌。译林出版社试图邀请专家来补译这几个部分。出版社对此要求十分苛刻,在对孙法理作了一番严格的审查后,最终决定邀请他补译朱生豪先生没有来得及译出的莎作,共14部,即:历史剧《约翰王》《理查二世》《理查三世》《亨利四世》上篇、《亨利四世》下篇、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斯》《露克丽丝遭暴记》、中长诗《情女怨》《凤凰与斑鸠》、诗集《激情漂泊者》和《配乐小诗》,还有新确认的三部作品:传奇剧《两个高贵的亲戚》、历史剧《爱德华三世》和长诗《挽歌》以及《托马斯·莫尔爵士(片断)》。

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正在出版莎士比亚作品原文注释丛书,其形式和当年让孙法理很得教益的商务印书馆F. A. Lombard的注释本莎剧相同。这套丛书是裘克安先生主编的(裘先生也是中国莎士比亚学会的副会长),包括新发现的佚作在内,此丛书共收录莎士比亚的作品36部,那时裘先生已安排了32部的注释,便决定请孙法理来注释剩下的4



孙法理译作《好兵帅克》获
第四届重庆市
文学艺术奖
原作者:捷克班甲斯拉夫·哈谢

校史校情

部,它们是:All's Well that Ends Well(终成眷属),Richard II(理查二世),The Two Noble Kinsmen(两个高贵的亲戚)和Edward III(爱德华三世)。这4部作品在孙法理注释后也都陆续出版了。

三

由于埋头钻研业务,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孙法理曾被人戴上“白专”的帽子,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兴趣,他仍然从事着他所钟爱的文学研究。1988年退休后,政治形势也宽松了,孙法理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文学活动中,笔耕不辍。由于收获颇丰,他被吸纳为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孙法理对英语语言文学,特别是英语戏剧和翻译,有较深的造诣和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教学成果卓著。孙法理已出版的译著、作品有:成部作品41部,论文28篇,散文、杂文、回忆录等29篇,共计800多万字,另有诗歌3000多行。孙法理的译著除上述14部莎士比亚作品纳入译林出版社的《莎士比亚全集增订本》外,还有《美国散文选》《苔丝》《双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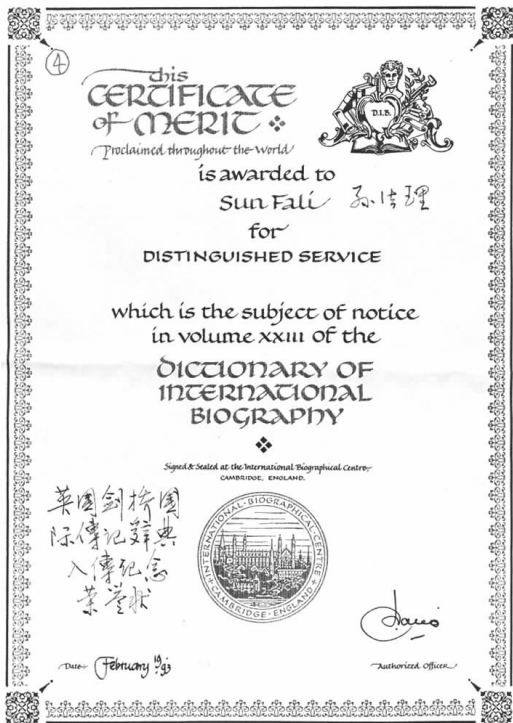


参加《中国革命回忆录》中文版首发式(右二为加拿大驻重庆领事戴尚安、左三为孙法理)

记》《野性的呼唤》《好兵帅克》《美妙的新世界》《神圣之路》《朗宁回忆录》《鲁滨逊漂流记》《红兔》《房龙地理》等。其中的《朗宁回忆录——从义和团到人民共和国》是加拿大驻重庆领事馆文教处主任廖忠登门约译出版的,出版时加拿大驻华大使罗岚与西南大学校长王小佳都写有祝贺信,并在西南大学举行了首发式。校长王小佳、副校长宋乃庆和加拿大领事戴尚安(Shawn Steil)等人出席。此外,四川电视大学还邀请孙法理编写了《英语语音学》课本,拟在全国使用。他的作品还有《马丁·路德金狱中书简》《吴宓小传》《纪念朱光潜先生》《亦狂亦侠亦温文》《苏梅百岁香犹冽》和《徜徉在历史与神话的幻影里》等,分别发表在《世界文学》《中华读书报》《作家文汇》、香港《大公报》、台湾《传记文学》、台湾《珞珈》等刊物上。孙法理的译著和作品曾多次获奖,《两个高贵的亲戚》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及重庆市作家协会首届文学翻译奖,《佛罗斯河磨房》获重庆作家协会第二届重庆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奖),《爱德华三世》获重庆市翻译学会优秀作品特等奖,《好兵帅克》获重庆市政府第4届文学艺术奖和奖金。他的译作《红兔》也已提名参加全国鲁迅文学艺术奖,结果尚待揭晓。

如今,孙法理虽然已年过八旬,却依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仍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继续行走在翻译和文学的道路上,期望和更多的人分享好的文学作品。

(编辑 郭兰)



英国剑桥国际传记辞典入传纪念荣誉状

十八学子勇闯海南

□采访/文婉 文/剑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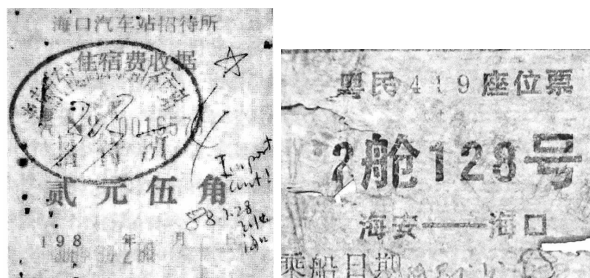
1988年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挂牌成立。当天《海南日报》特意出版了号外,满城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街头上舞狮敲锣,鞭炮齐鸣。在这样的背景下,无数满怀梦想的年轻人,坐火车一路南下至广东湛江,再换长途汽车至海安码头。大家挤在狭小的船舱中,一边忍受着难闻的气味,一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就是坊间所谓的“十万人才下海南”。在这之中就有十八位来自原西南农业大学的学子。

选择:热血沸腾

当年读书毕业是包分配的。所以,未到海南之前,学校便派专人赴海南考察,并与政府签订了协议。能够去的自然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如王洪强,性格开朗,成绩优秀,获得过奖学金,身为班长有组织能力,文艺能力也很强。还有赵玉明、沈映华、岳平、周燕华、文德良等。虽然每个人都有多种选择,但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海南作为新区,发展一定特别快,这片处女地更需要自己去做贡献,再加上国家和学校都鼓励优秀的年轻人奔赴边疆,撒播热血。然而海南到底什么样子?大家对海南的了解很少,通过地图上知道海南在祖国的最南端,觉得是那么的遥远。然而,这些充满了激情的年轻人们没有犹豫,这十八位年轻学子像勇士一般乘着“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大潮,义无反顾的走向了海南。谁知道,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

初到:出乎意料

7月3日,学校专程送大家到火车站,随后向每人发放了200元的补助还有一些粮票。到了海南已是7月5日。



到了海南时才发现,海南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下车之后连的士都没有,当地政府接待人员把这18个人用两辆三轮车送到省政府人事厅。一路上过去,顿然觉得海南的竞争极其残酷,因为去到海南的大学生太多了,街头一夜之间变得拥挤不堪,充斥着大量戴着眼镜、身穿中山装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就业供需不平衡,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只好在那里洗碗、卖油条、扫地,甚至沦落街头卖唱的都有。当时有的道路甚至没有红绿灯,交通警察手里拿的不是指挥棒,而是石头或树枝,见有人违章就会扔过去。再加上分配工作也并未按照大家自己的意愿,除了赵玉明分配在海口市园林园科所以外,其余都将被分配到海南的农场和县,大家当时就傻眼了,前几天还自诩为天之骄子的他们,一下子成为了沧海一粟,被淹没在了十万人才大军里头。本想学以致用,报效国家的,怎么能这样草草了之呢?大家觉得,要么就回来,要么就去找海南方面继续协商,改变分配方案。

后来,海南方面高度重视,决定连夜商量大家重新分配问题。那一夜,17个人挤在卫生厅招待所里,一张席子,一个枕头,整夜焦急的等待。

第二天一早,听到分配结果的时候,大家才舒了一口气,主要分配到海口、三亚等地。沈映华、蒲进芳去了海口国土局,岳平去了环保局分析水质,宋加刚去了海口市农行,杨高文去了琼海农行,孙向东在海南农经干校当老师,杨典华去了琼山植保站,王洪强

去了琼海农业局,文德良去了新中农场……
事已至此,只有靠自己奋斗才是出路。

工作:困难重重

初来咋到,人生地不熟。

王洪强才到海南就被偷了120元,那时候每个月的工资才123元啊!心疼的不得了!赵玉明住在距离城中心几公里的地方,交通极为不方便,路全是泥泞的小路,快走也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于是硬着头皮向单位借了150元买了辆琴鸟牌自行车,约定的是每个月还50元,结果不到3个月,自行车却被人偷走了,当时又生气又心痛。

除开这些,工作和生活环境也相当的恶劣,赵玉明去的海口市园林局下的研究所,连试管都没有一只。生活的地方就在一个垃圾场旁边,墙就是几块砖头合着木板搭建的简易木板房,书桌都是当时曾经用来托运书籍的纸箱子糊的。这里属于热带气候,下雨天说来就来,暴雨一到,屋外就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王洪强他们几个经常来赵玉明这里聚餐,就在屋外生火,浓烟熏的满脸泪水,做好饭菜后端进屋,在纸箱做的小条桌上垫张油纸就将就着了。文德良到的新中农场,天高地远,环境恶劣,他仿佛来到了化外之地,听着叽里呱啦的语音,连故乡的方位都辨不清。满心的失落与迷茫令他大病了一场。

所以,在单位安排的木板瓦房住了4年后,赵玉明毅然投入商海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创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帮别人进行园林设计。每一次着手新工程,他都自己骑车摩托车到下面的县去买树苗,一般都需要骑上好几十公里,那时候的路况不好,车的链条极易坏,自己下车修理要好一阵。最糟糕的还数遇上暴雨天,不得不推着摩托车在泥水间前行,走着走着,天慢慢就黑了。年少意气风发,每当签单时很是激动,这么多年过去了,赵玉明对于商海投资有了自己独到的认识,借用一部电视剧《下海》的台词“每一个下海的人,都要死一回”,只要是心不死,保持昂扬的斗志,就会重新立起来。公司经营最艰难的时候,连公司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面对困境他也没有退缩,而是借钱把困境渡过。之后的第二次创业,从2000年至今,赵玉明都在做涂料产品,而且越来越

好。所以面对商海几经沉浮,坚守自己的选择继续走下去很重要。

相比较而言,王洪强的工作环境倒还好些。被分配到市里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住的地方在郊区,一室一厅,两张1.5米的大床,房间内有一台内陆少见的彩电,还是日本松下牌,能收到8个频道,这台彩色电视机陪伴了这个年轻人无数个边疆夜晚。而且单位工作人员第二天就搬来煤气罐、煤气炉、所有的厨具,甚至包括盐,算来将近1000元,一笔不小的金额,差不多接近一年的工资收入。这让王洪强感觉得到单位对自己特别的关爱和器重。

由于跟当地语言不通,最开始王洪强还是很孤独,但经过不断的接触,慢慢地认识了不少朋友,比如当年琼海市的政协主席,便跟他成了多年的忘年交,政协主席在王洪强困难的时候曾说:“为人,最大的成功是正直,真正的勇士才是金子,才会发光。”这句话对王洪强至今影响都很大。

对文德良而言,突如其来大病拯救了他。病愈后,他开始慢慢的冷静,开始思考今后的路该怎样的走下去。他调整心态,慢慢的将自己和当地人融入到一起,跟他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将所学的专业知识与当地实践慢慢的结合起来,并从中总结升华……一路走来,他慢慢的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也慢慢地成长、成熟起来,开始适应这里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他从一名普通的农业技术员到副科长、科长、农场场长助理、农场分管生产的副场长、海南橡胶集团下属分公司总经理。所以只有扎根于基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方能锻炼自我,超越自我。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些困难的磨砺,让这些昔日的学子们迅速的成熟、成长起来,同时逆境也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不能被边缘化,要干就要干到最好!所以,今天的成绩都是这些年轻人一步一个脚印地打拼出来的!

坚持:中流砥柱

王洪强在第一个岗位上一呆就是15年。这些年,他几乎把所有的收入都拿来买书,研究番石榴和香蕉栽培。不断的钻研和学习,终于厚积薄发:2003

年7月1日,王洪强作为技术骨干被派到五指山对口扶贫,进行果树技术的指导工作。2005年4月11日,琼海市行政服务中心成立,王洪强被提拔到琼海市,2005年7月在市委领导的常务会议上正式被破格提拔为政务中心秘书长兼主任,主要负责大农业板块,一干就是5年多,2012年11月请辞了秘书长一职,专任政务中心主任。

赵玉明,靠自己的创业圆了多年的一个梦想,创建了海南原生态的品牌。其商业理念就是利用海南热带原生态特色饮品食材,做海南最好的原生态休闲饮品,在3-5年成为国内知名的值得人们信任的海南文化元素品牌。这个梦想不是一朝一夕促成的,前前后后10年的准备时间,赵玉明和他的团队钻研了许多产品。他说,海南的22年,我把青春献给她,我们这一批留在海南的西大学子对海南都有着浓厚的情结。现在,我想将后半生也献给海南,创立海南知名品牌“弘扬海南文化”并将其影响力辐射至全国。

文德良,一名守卫橡胶事业的橡胶人,二十五年如一日的坚守在海南农垦的这方热土上。他说,我不算一名成功者,但我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住了磨练和考验,这是需要信心和勇气的。潮起潮落,当时的“十万人才”能坚守下来的不多,也许我算一个执着者,我觉得总该干一行爱一行,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很多人选择了跳槽,我依然坚守住海南农垦这方热土。凭着他这的这股坚持劲儿,从大学毕业到现在,王德良从一名普通的农业技术员到副科长、科长、农场场长助理,农场分管生产的副场长,海南橡胶集团下属分公司总经理。

……

这就是这些漂泊异地他乡的西大学子的梦想!

当年的沈映华后来曾任海口市储备中心主任,还担任过海口市不动产评估所所长;岳平现任海南省环境科学院院长,是现在海南环保界的专家级人物;蒲进芳现在已经是橡胶问题的专家了;宋加刚现任琼海市农行行长;杨高文后来回到四川,现任在四川简阳农行工作;孙向东后来去省政府采购办担任

专家;杨典华后来任新区开发办主任;文德良对柠檬等果树颇有研究,现任新中农场分公司经理;胡明当年被分配到万宁国营华侨兴隆农场,现在这个农场已经被开发为新农温暖度假胜地;蔺中全现就职于农田总局科技处;周燕华现任海南省农业厅副厅长。……

20多年过去,这些初生的牛犊已经成为了海南建设发展的中流砥柱!

寄语:校友情深。当电话里问到他们,这么多年的闯荡之后,想给学弟学妹们说些什么呢?

王洪强说,当年秦老师64岁时仍亲自爬到树上教大家剪枝嫁接的时候,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亲手去做的事情,才能真正学到自己身上。学生时代就要认真学习知识,在学习中培养工作和生活的乐观、向上的态度,机会永远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其次,多读书,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靠得是平时积累,不同门类的知识要善于联系,凡事都要从本质入手。另外还要学会读“大书”与伟人对话,独立思考,科学对待事、物和人,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才会有自己的话语权。最后,就是坚持。

十八勇士在当年对海南不了解的情况下闯海南,24年过去了剩下11个同志还在海南坚守奋斗,无论情况如何艰难困苦,情况如何困顿,要学会乐观生活,才会不断发展壮大起来,闯出了自己的天地,要学习在本单位树立自己的形象,不计较得失,成就每一个自我。

赵玉明也提出了成功四要素:激情、责任、能力和品格,希望学弟学妹们一定要在这四个方面进行修为,记住情商永远比智商重要,吃亏是福。现代人的通病之一就是太急躁、太功利,生命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成果的要素之一就是坚持,要坚守、坚持、持之以恒,才会有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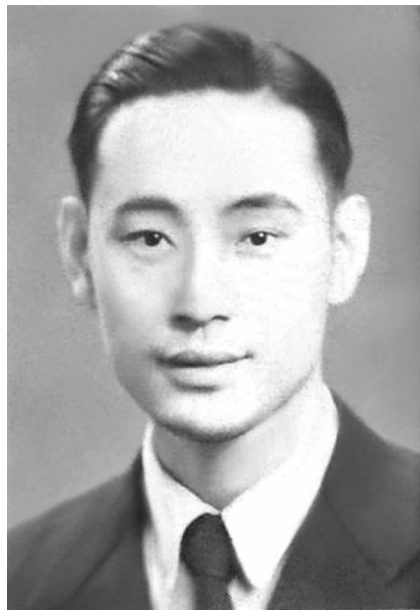
当年的十八勇士闯进海南,用自己的年轻汗水和激情,在这块热土上拼搏奋斗,终于成就了今天。

真心祝福你们,亲爱的校友,感谢你们一直心里惦记着母校,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民族大业同心铸 渝州岁月千秋美

——劳君展与家父的一段往事

□文/朱渝生



朱世禔¹

20 世纪 40 年代，父亲朱世禔与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劳君展教授同时客居巴蜀渝州，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他们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以下简称女师

院)一起共事，不仅励精图治、兴学育人、弘文励教，而且两人过往甚密、配合默契，结下了深厚友谊，亦在重庆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记忆。人勤春来早，春节 7 天长假，我在重庆都市花园缙云山麓，精心搜集、挖掘文献史料，走访相关人士，潜心研究，深情撰写 20 世纪这段留在记忆中鲜为人知的往事，以缅怀亲爱的父亲和故去的诸位尊敬的学者和先生。

为救国海外留学 为民主创九三学社

劳君展(1900-1976)原名启荣，湖南长沙人，出生于一个宦宦世家。青年时代就读于长沙周南女校。五四运动期间，任长沙学联宣传部长，创办《女界钟》杂志，加入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1919 年秋考入上海东南大学。同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 年暑假，劳君展获得里昂大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巴黎大学专攻数学，之后师从居里夫人，攻读放射性物理学。居里夫人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是巴黎大学第一位女教授，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劳君展是她倾情培养的唯一一位中国籍女学生。

1925 年 4 月 16 日，劳君展与许德珩²在法国巴黎中国饭馆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蔡元培作主婚人，父亲的舅父何思源³与徐悲鸿、刘半农夫妇和严济慈等 34 位留法人士到会祝贺。蔡元培还题赠贺词：“爱心同结，互助互利。学术事业，勤奋不已”。婚后，劳君展工作于镭研究所，成为居里夫人的亲密助手。

1927 年，劳君展于法国学成回国后，先后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等院校任教授。在繁忙的校务、教学、科研之余，她笔耕

¹ 本文所有图片由朱渝生老师提供。

² 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著名政治活动家、教育家、爱国人士，九三学社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³ 何思源(1896-1982)，山东菏泽人，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后赴美法德等国留学。1926 年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28 年出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1944 年任山东省政府主席，1946 年 10 月调任北平市市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毛泽东与劳君展(左一)等在一起(1960年1月)

不辍,翻译出版了《积分学纲要》,并与严济慈教授合译《法国高等数学大纲》等著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节节败退,南京政府被迫内迁重庆。1938年10月25日,湖北武汉失守,劳君展一家只得前往战时陪都重庆。她带着孩子,背着行囊,一路奔波,先期到达渝州,租居于重庆市区国府路的一处民房。没想到,隔壁居住的却是中统大特务徐恩曾,他的老婆是中共变节分子,经常以串门为借口,打探情报。虽然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许德珩和劳君展依然积极为民主事业和抗战救亡工作呕心沥血。

1940年9月,劳君展租住的房子被日机炸毁,损失了许多珍贵资料和书籍,她极为痛心。全家只好搬到枣子岚垭的“雅园”,由于住在半山腰,生活更不方便,但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更为深切。

1944年底,为了探讨民主与抗战问题,许德珩夫妇在渝文化、教育、科技界中,联络爱国知名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以聚餐的形式,组织“民主与科学座谈会”。劳君展不顾个人安危,经常与各界人士聚会,讨论时局和实现全民抗战的对策,全力支持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毛泽东在红岩嘴(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约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吃饭。一见面,毛泽东就拉着他们夫妻的手,谈北大,谈新民学会。原来,劳君展是新民学会骨干之一,她和毛泽东是湖南老乡,早就

相识。在北大时毛泽东与许德珩常见面,也是老熟人了。谈话间,劳君展说到1936年,延安那边食品供应紧张,特别是得知因缺乏计时怀表而不利于指挥作战的情况,便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购买钢笔、怀表、布鞋及一些便于储藏和携带的火腿等物品,加上陈嘉庚、张学良、宋庆龄等爱国人士及多国侨胞踊跃捐赠的物品一起交给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徐冰(曾任周恩来秘书),由他转送延安,不知是否收到了。毛泽东一听,高兴地说:“吃的吃了,用的用了,帮助红军度过了饥荒。”对此义举,毛泽东曾亲自致信(此信原件保存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感谢说:“我们与

你们之间,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许德珩则向毛泽东汇报“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认为极有价值,鼓励他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老友相逢,叙谈颇多。告别时,劳君展不无忧虑地说:“重庆气候不好,山城不可久留,早作归计为好。”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的安全着想,她奔波于山城各大专院校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广泛开展工作,争取他们对中共代表团的同情与支持。

1945年9月,为纪念世界民主力量击败法西斯,许德珩夫妇与朋友们在重庆青年大厦举行庆祝大会,并决定将“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九三座谈会”,后又改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在重庆青年大厦召开,大会发表了《九三学社缘起》《成立宣言》《基本主张》《对时局主张》等文件,选举许德珩等16人为理事。

育人才鞠躬尽瘁 为教育接手女师

抗战爆发后,中国教育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针对国统区的“师荒”问题,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创设了国立师范学院制度,并决定在国统区分区设立师范学院,藉以培养中等学校的健全师资。从1940年至1947年,全国共办有独立设置的师范学院9所,女师院是其中之一。1931年中国唯一的一所女子高等师范院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入北

校史校情

北京师范大学后,中国就没有国立女子高等师范教育机构了,可以说女师院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女师院作为战时国统区的女子最高学府,是教育部为培养后方女子师资而建立的。女师院成立之初,设置的系科共有:教育、国文、英语、史地、理化、音乐、家政7系和体育专修科。以后陆续增设了附属单位,大学部也增设了其他系科。女师院为四年制本科,面向全国招生。首任院长为教育部督学、留美心理学家谢循初⁴。其学院门匾采用隶书题写,但其是否出自1940年该校初创时首任国文系主任、部聘教授、著名学者型书法家胡小石(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国文系主任,是父亲中大读书时的老师)先生之手,有待日后考证。

1945年盛夏,随着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凡由沦陷区迁来内地的高等学校纷纷迁回原籍,国民政府教育部原拟令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迁校南京。当时,由于重庆政治、经济及社会地位的提升,1946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决定把位于重庆江津白沙镇新桥的女师学院搬迁至重庆九龙坡黄桷坪(原上海交大校址)。然而,这一变动引发校方师生极大不满,导致师生不断请愿、罢课罢教,并与教育部对峙,所以学校拖至1946年8月才搬迁完毕。教育部任命劳君展教授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第二任院长。

为确保女师院在黄桷坪新校区顺利开学行课,劳君展克服重重困难,志展宏图,广纳人才。而此时父亲朱世禔正在沙坪坝重庆南开中学教书。巧的是,劳君展的儿子许中明⁵之前就在南开中学就读,父亲正好教他的语文课兼班主任,因此父亲与劳君展得以相识。而父亲的舅父何思源与劳君展的丈夫许

我所认识的地下党员一览表

姓名	简介	地址
石山 原名靳奎甫	1939年9月在伪中大入党的介绍人,1940年春由组内潘延宝、曹尚可在沙坪坝区工作	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
陈之晖	1939年我在伪中大入党的介绍人	北京教育部心理研究所
杨静	1939年9月到年底同一党小组,由石山领导	听外调回来讲是在南京及干校
刘毓泉	1939年同一党小组,安徽人	不知现在何处
申惠文	同	同上
周敦华 原名周寿祺	同在中大文学系活动,1939年离开中大,后被不脱得他走地下党员	解放初期在长春文教局
杨贞淑	同在中大文学系活动,1939年考延安,后被不脱得他走地下党员	不知现在何处,石山了解
黄文澍	在中大搞文艺时认识,1939年去延安,后被不脱得他走地下党员	同上
赵澧	同在中大文学系活动,后被不脱得他走和曹尚可一个支部的党员(新支部)	北京人民大学
丁靖宇	在中大搞文艺时认识,在中大经常接触,后被不脱得他走地下党员	在安庆中学
李春辉	在中大搞文艺和中文系活动,1940年去延安,后被不脱得他走地下党员	解放初期在北京高教部,石山知道
庞文远	在中大搞文艺时认识,1940年底撤退,后被不脱得他走地下党员	不知地址
何原 原名何和隆	1940年初同在沙坪坝支部工作,在去延安	解放初期在北京工作
沙昭瀛	1940年初同在沙坪坝支部工作	听外调回来讲是在上海
孙少礼	1940年初领导我,1940年8月至12月初和我同在沙坪坝支部工作	北京外交部
曹自明	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和我同在沙坪坝支部工作	解放初期在延安任陕西省人民广播电台
熊原 原名熊运恒	1940年底撤退到重庆大学支部任委员,我有时领导他	曾在四川省委组织部任地址不清
何叔宽	中大支部分支,后被我和他俩看管,中大熟悉	不知地址

朱世禔手稿——我所认识的地下党员一览表(之一)

德珩不但是同学,而且是挚友。他们同在北大读书,且都是五四运动北大学生会负责人,毕业后又一起公派到法国勤工俭学。不过即使有这些关系,父亲一开始并未答应劳君展院长的聘任。如今,可以正式解密68年前那段岁月往事了,其主要原因是:父亲当时是地下党员,正准备回故乡山东开展地下活动。

父亲早在1939年4月,在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读书时就加入了地下党,后来曾任沙磁区特支组织委员。1940年8月,父亲于中央大学毕业

⁴ 谢循初(1895-1984),安徽当涂县人,早年在美国易理诺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心理学,回国后在全国多所知名大学任教授,是著名心理学家,曾任上海市心理学会理事长,著有《心理学史》、《心理学纲要》、《心理学》,译著有《现代心理学派别》等。

⁵ 许中明,原名许仲明(1929-2002),江西省九江人,1940-1946年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1946年暑假考入清华大学。他是电视技术专家,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主要技术领导人之一。

后,在该校教务长童冠贤教授的推荐下到重庆南开中学教书。当时推荐信是写给南开中学教务主任喻传鉴的。喻传鉴是张伯苓的得力助手,主持学校常务工作,后任校长。作为该校教学质量的把关人,他长期担任教务主任和中学部主任,对教师授课要求得十分严格,丝毫不松懈。凡曾在南开中学就读或者任教的人,几乎都认为喻传鉴最能体现南开的实干苦干精神。他把一生精力“倾注于实现南开“允公允能”之校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6年1月,父亲在国立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李泰华教授出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同年初春,李泰华约父亲回山东作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同时还约了父亲中学时的英文老师马观海(早年毕业于北大西语系),父亲的同乡、南开中学的同事刘兆吉(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教育系)及父亲国立中央大学的同学李福祥等人回山东,请他们出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科长。2014年4月21日下午,我到刘兆吉次子刘重来(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家中拜访,也证实了此事。他说:“当年父亲已经开始变卖家中衣物,准备回鲁,后来由于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的劝阻才未成行。”

1946年4月,李泰华与时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邓目舫、省建设厅厅长丁基实(原名丁履俱,早年赴德国留学,1925年春加入地下党,后改名丁君羊、丁群)等要员组织班子准备回山东时,还在中央大学召集了一次沙磁区山东人旅渝同乡座谈会(父亲未得到邀请,故没有参加此会,但在文革时期的手稿中有详细记载),名义上是征求大家对回山东去工作的意见,实际上是拉拢一批山东籍的知识分子支持他们的工作。事后,父亲听说召集人有李泰华和丁基实。一周后,他们向父亲等数人预发了3个月薪水及路费。然而,早在1945年秋,父亲就向沙磁区党组织提出回故乡山东开展地下活动的要求。当时父亲的舅父何思源在山东省任政府主席,沙磁区地下党考虑到重庆地下党工作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便同意父亲回山东去,以便于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不久,父亲经过重庆大学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熊扬介绍,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找荣高棠同志转组织关系事宜。荣

高棠告诉父亲,组织关系将由代表团带到南京去,让父亲回山东时到南京转组织关系。这一决定是1946年初做出的。由于父亲党组织关系即将调动,加之从事地下活动的党员都是单线联系,他不可能、也不能把此事告诉劳君展和其他任何人。故父亲未答应劳君展院长的聘任。之后不久,劳君展携丈夫许德珩,又专程赶到南开中学津南村驻地,看望他们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同学何思源的姐姐何思霞。另外,劳君展还带去一条精美的披巾送给我大姐朱渝敏(当时她只有2岁多)。当年大姐还披着这条披巾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和这条珍贵的披巾,至今保存完好。日



朱渝敏披上披巾留影

前,大姐从昆明把这张相片寄给了我,从而可以收入书中以作佐证。

这次他们来找父亲再次商谈,由于劳君展的盛情和诚挚相邀,加之许德珩出面,父亲的确打不开情面,只好答应短暂协助劳君展接手女师院,一旦人事、教学步入正轨,就将离开女师院回山东。

战友情临危受命 战恐怖坚持斗争

1946年9月,女师院在黄桷坪新校区正式开课。父亲受劳君展院长之聘,出任女师院总务长兼国文系副教授,协助劳君展院长开展工作。与父亲一道受聘上任的还有重庆中央工业专科学校童家溪分校主任宗真甫⁶,他出任女师院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

⁶ 宗真甫,1917年入北京大学,1923年赴法国里昂大学读书。第二年在巴黎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46年朱世禔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师生合影
(第二排打领带者为朱世禔)

这一职务是由潘仁斋介绍的。那时,父亲和宗真甫刚上任,且年富力强,他们励精图治,革故鼎新,赤心报国,鼎力兴邦,积极献计献策,全面开展各自分工的工作,成为劳君展院长的左右助手。

父亲刚到女师院第一学期,一切都那么无序、不顺利。校内外青、红帮和宪兵都给学校教学、总务等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干扰。学校移交下来的超额人员多,移交下来的校警经费无着落,加之父亲从未干过总务工作,有的困难很难克服。当时父亲感到压力很大,整天考虑怎样解决问题,同时还要熬夜准备国文系的课,工作量极大。不过父辈这一代知识分子,经历过8年抗战,知道战争的残酷、工作的艰辛、生活的困难,从而懂得一个人要如何服务社会、报效国家。有道是“春风艳桃李,热血培栋梁”。

女师院以培养合格的未来教师为目标,力求保证教育教学质量。所以他们特别注重加强师资力量。当时父亲和宗真甫代表劳君展在女师院办移交时,把张臻一升为副教授,劳君展的妹妹劳启华亦在女师学院理化系任教。随后宗真甫又介绍耿振华、杨欣

安、田子贞、李峻岳等老师到女师学院兼课(故对他们都有一些加薪)。解放之后,全国院系调整,这些老师都到了西南师范学院任教。

1947年5、6月间,“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在全国展开。此时,作为大后方的重庆也掀起高潮。当年夏天,重庆高校发生“六·二”大逮捕事件。女师院也不例外。父亲在1970年7月26日写的一篇“我的问题的简要材料”一文中,有这样的详细记载:

1947年6月1日深夜2日凌晨,伪派出所所长蒋孝儒带着二三个特务,打开我的房门(当时我住在校门口办公室二楼),说:“这是长官公署来的。”特务就拿出一张学生名单,说:“长官公署要你们学校,马上把名单上的学生交出来。我们现在已经派部队把学校包围了。”我说:“我是管总务的,不管学生的事情。院长到南京开会去了,要找学校你们就找代理院务的宗真甫。”特务说:“马上派人找他来。”宗真甫来了后和我商良后拒绝交人。”同时要求和他们一起到重庆长官公署去解决,特务不同意,又叫找训导主任(姓兰的,刚到学校不久,当时生病不在校),后来又找训导员韩智中和肖义高,当晚都不在学校。特务说:你们马上交人,不然学校负责人要带我们去抓。宗真甫说:我没有交人的责任。特务后来说:你们拿学生照片来,我们说:没有。特务说:你们招生和注册都有学生照片嘛!一定要拿来。强迫我们拿学生的照片,我们不从。特务就要宗真甫带他们去抓人。特务说:你们不许拖延时间,非马上派人不可。天亮了带不走人,你们要负责。当晚特务带着军队到学生宿舍去,一直闹到天亮,还是把宗真甫和被抓的多名学生一起带到重庆市区去了。二天后看到报纸登载了国民党当局召开了各院校负责人座谈会的报道,会上许多人表示不满国民党大批逮捕学生的作法,并与谴责,宗真甫则痛哭流涕地诉说特务深夜到女师院抓人的暴行的消息。

那次女师院被特务抓捕的学生就有30余人,教务长宗真甫也被带走了。而此时劳君展院长正在南京教育部开会,不能脱身,她电告父亲积极组织营救。遵照劳君展院长的指示,父亲以总务长和地下党员的身份,组织留校学生立即成立“营救被捕同学后援会”,与学生一起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他组

织召开大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妥善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缜密工作。本着“学生至上,以人为本”的精神,劳君展回校后也亲自营救被捕学生。当时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解放军在正面战场上不断取得战略胜利,加之学生示威游行、反应强烈,社会进步舆论和广大人民群众大力谴责,国民党特务又找不到学生任何罪名,被迫通知各院校保释被捕学生。女师院被捕学生除学生会主席汪盛荣送武汉交她父亲教管外(因其父亲是伪长官朱绍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其余全都由学校保释,回到学校继续上课。

经过大家数月卓有成效的工作,到1947年第二学期,学校人员和经费基本解决,学校逐渐步入正轨。此时,父亲先后多次向劳君展提出辞职,要回山东工作,然而劳君展坚决不答应。这事宗、潘二位教授都知道,后来宗真甫和潘仁斋还曾到家中给父亲做工作,劝父亲留在女师院继续工作。

当年,父亲准备回山东,曾托山东省政府驻渝办事处以教育厅科长的名义在行政院留守处登记飞机票。当时全家5口人(祖母、父母亲及大姐、二姐,当时哥哥和我还没出生),要走也不易,但后来又走不了,这让父亲思想极为矛盾,可以说这是父亲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最后,他为了帮助劳君展,选择把自己留在了女师院、留在了第二故乡重庆、留在了缙云山麓,而且在重庆一留就是几十年。从此,父亲就再没有踏上生他、养他,且让他十分眷念的故乡山东,这不能不说是父亲人生的一大憾事。

图革新成绩斐然 反内战不断前进

1946年九三学社在渝成立后,劳君展的丈夫许德珩于5月14日飞抵北平,后被北大聘用。这年暑假,劳君展之子许中明在重庆南开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电机系,女儿许鹿希⁷考上了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姐弟双双中举,并蒂花开,共跨名校。就这样,他们在北大安了家。而劳君展则继续战斗在山城,战斗在女师院,与家人在南北两座城市市过

着分居生活。

劳君展从1946年1月至1947年暑假,在女师院院长岗位上任职近两年,工作卓有成效,学校发展较快,声誉日隆。1947年“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革命学生运动蓬勃展开,此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自卫战争,冲击着蒋介石反动政权在蒋管区的统治,使反动派十分恐慌与仇恨。当时,国民党出刊的《新华时报》更加疯狂地攻击和诬蔑女师院学生会主席汪盛荣和院长劳君展,说女师院重要行政人员也有问题,女师院已经成了另一个世界。这预示反动派在大造反动舆论之后,即将向革命师生开刀。此时,劳君展不顾个人安危,同情并全力支持学生运动,自己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从而引起当局不满,最后被迫辞职。在劳君展生命受到威胁之时,许德珩电请国民党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代买机票。之后,劳君展于7月15日平安飞抵北平,一家人终得团聚。登机时父亲和女师院多位教授到机场话别相送。

劳君展辞职后,1947年8月,张邦珍出任女师院第三任院长。张邦珍上任后,由于父亲和宗真甫在办学观念等方面与这位新任院长意见不和,加之张邦珍为了任用自己的核心助手而将两人解聘,他们先后离开了女师院。

新中国成立后,劳君展与父亲多有交往和书信往来。他们曾经在女师院并肩战斗,且结下了深厚情谊。之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为党和人民谱写千秋业绩。

西南大学前赴后继 女子师院永世留名

时光的流逝不能带走我们对那段岁月的记忆。女师院自1940年在江津建立至1950年10月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组建西南师范学院,经历了十个寒暑春秋,院长也几易其人。这几任院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毕业于名牌大学,且都有在西方留学的经历,中西文化、中西教育相互交融,从而铸就了他们胸怀教育、心存学生的办学理念。

(下转第39页)

⁷ 许鹿希,1928年8月生于上海,1953年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留校任教,同年与邓稼先结为夫妻。现为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文/张春 封期川 整理/封期平

封昌远教授生于北洋军阀混战之际，那时候国家贫弱、民不聊生，他自幼便立志要振兴中华。



刚到北平大学时的封昌远¹

1927年3月24日，南京人民庆祝北伐军攻占南京，集会游行时遭到英国军舰炮击，打死打伤无辜群众2000余人。此消息传到重庆后中共重庆地委决定：3月31日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联盟”发起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声援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没想到却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只有13岁的封昌远，全凭机智勇敢，找到一根不知是谁挽在城墙垛子上的绳子，拉着那根绳子，从高高的通远门城墙上缒下，才得以脱险。

青年时代，封昌远求学于北平大学，以期学业有

成、科学救国。1935年，北平学生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那天封昌远冒着军警的枪林弹雨勇敢地冲在前面，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他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

封昌远大学毕业时，正值抗战爆发的民族危亡之时，他毅然放弃北大优厚的待遇，义不容辞地返回故乡参与大后方建设，奔走于成都、重庆、西昌、湖北等地，指导当地的农业改进工作，在而立之年就已硕果累累；抗战时期、国共内战时期，封昌远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入住红岩村大有农场，倾力协助爱国民主人士饶国模，支持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工作；解放初期，封昌远又将他在红岩村的那份地产及房屋无偿捐给重庆市妇联，尔后全身心投入国家教育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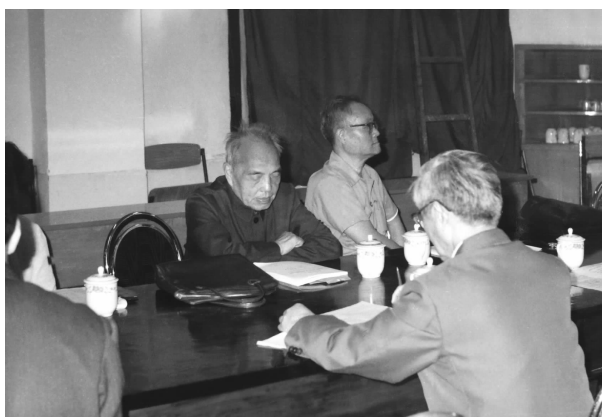
建校初期，封昌远参与建校工作，四处奔走，为西南农学院的建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他被聘为植保系教授，他除了尽心教学，还积极参加学校的社会活动，所以兼了学校工会副主席。建校初期，学校的幼儿园是由校工会筹建和管理（即所谓的民办幼儿园，直到70年代中期才转为“公办”），由于校工会资金窘迫，学校的幼儿园就在现在的三十四教学楼旁的一个老旧破败的小三合院里凑合着。条件差还是其次，主要是幼儿园在教学区内，教职工宿舍都与教学区相隔一条公路，公路上车来车往，小孩子上幼儿园很不安全。于是，封昌远和校工会的同仁们多方筹款以重新修建幼儿园。一天，封昌远意外地收到蚕桑系韩惠卿教授的一封信，信上说她准备捐一笔钱给校工会，用作新建幼儿园。封昌远高兴极了。有了韩惠卿教授的捐款，加上校工会已经筹集的部分，简直就解决了大问题。在筹够了款后，封昌远和校工会的同仁们就用这些钱着手在宿

¹ 本文图片由封期平老师提供。

舍区同一边、又居中的地方，修建了一个新的幼儿园。这个幼儿园至今还在用，只是增加了几幢新房子。现在的幼儿园还在那个地方，说明当时的选址很有发展眼光，同时有了新楼房，还在用当年建的平房，也说明当年的建筑质量还是过硬的。新幼儿园的建立，为后来教职工解决了后顾之忧。

1958年，封昌远被无端污为右派，受尽屈辱。即便在生活极端窘迫、身体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他仍不顾生命危险四次从河里救出四名溺水少年，他们都是学校的教职工子女。也许是被救少年回家怕父母担心或是怕被父母责备，干脆就没说；也许说了，但他们的父母怕和“右派”沾上边，被人扣一个没站稳阶级立场的帽子，所以选择了沉默。究竟他们当年是怎样想的，我们不得而知。被划右派后的整整20年，封昌远被剥夺了一切工作权力，既不能进行教学也不能进行科研，有的只是无休止的检讨和劳动。在那些充满屈辱的日子里，一个没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念的人是无法熬出来的。但封昌远就是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和信念，凭着一颗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任何人的宽容的心，凭着先天带来、后天锻炼的强健体魄，终于熬出来了，熬到了改革开放的这一天。虽然这一天到来时，他已是耄耋之年，但为了追回那失去的20年宝贵光阴，他依然老骥伏枥，潜心教学、投身科研、著书立说。

封昌远在教书育人方面堪称师范之楷模。他一生呕心沥血培养科技人才，积极热情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学贯中西、文理兼蓄、底蕴深厚，所以教学开放，同时也能做到有问必答。课堂上，他妙语连珠，风趣幽默，枯燥的病虫害理论被他讲得深入浅出，学生们也都兴趣盎然，因此他的课总是座无虚席，就连在阶梯教室也是一座难求。他待学生如朋友、似子女，在授业解惑之中深蕴为人之本、从业之道，深受学生爱戴。不少学生受他的影响立志要终生投身于农业科技。封昌远从教数十年，桃



讨论工作

李满天下。他的学生里既有蜚声中外的杂交水稻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袁隆平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明珠，也有各省、市、县主管农业、林业的领导人，还有无数优秀的教师和科技工作者。

封昌远著述颇丰，成果斐然。至今已出版《仓库害虫》《柑橘害虫及其防

治》《园林昆虫学》《植物检疫》等多本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他还数十次主持和参与全国性学术会议，也主持和参加多种教材的编审和编辑工作。他一生呕心沥血培养科技人才，积极热情地参与和指导研究生论文答辩会，指导校内外各项科研和教师进修等，为中青年教师和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封昌远素以回报社会为其天职，他或以顾问、或以老年志愿者的身份来实现以实际行动服务社会的理想。他不仅从教于高等学府，甘当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还长期奔走于基层。乡间地头、大山林区、城市园林、物流储仓、城市害虫防治区等都是他经常深入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地方。封昌远曾担任过中国昆虫学会委员、中国昆虫学会城市昆虫专业委员会主任、重庆市昆虫学会秘书长等职，他热心参与昆虫学会、植物保护学会等学术团体的工作，对学会的发展、学术的交流、科技人员的成长、诸学会对社会的服务等方面贡献卓著。

封昌远品格高尚，心态平和，尽管在百年人生中经历了无数险风恶浪和挫折，但拳拳报国之心始终不曾改变，甚至在他被错划成右派时，在没有工资、每月只有18元生活费以及家庭人均生活费不足3元的情况下，也能做到忍辱负重，舍己为人。

封昌远对祖国、对人民一片赤胆忠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解放前，他与恩师董时进一起创建了中国农业协进社（董时进任主席、封昌远任秘书长）；1944年9月，他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人证物证都有，与他同时加入的人都得到了承认同时退休后都享受离休待遇，（下转第39页）

小儿眼中的吴宓

□文/邵培德

现在的天生桥,高楼林立,已经大变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与西南师范学院隔路并排的天生桥街区就只有一条长街加几条小巷子而已,一楼一底的砖柱穿斗夹墙房子,木板门面,斑斑驳驳,灰不溜秋的叫今天的人看了,要多晦气有多晦气,真的是不堪回首——然而,那里却是我们儿时的乐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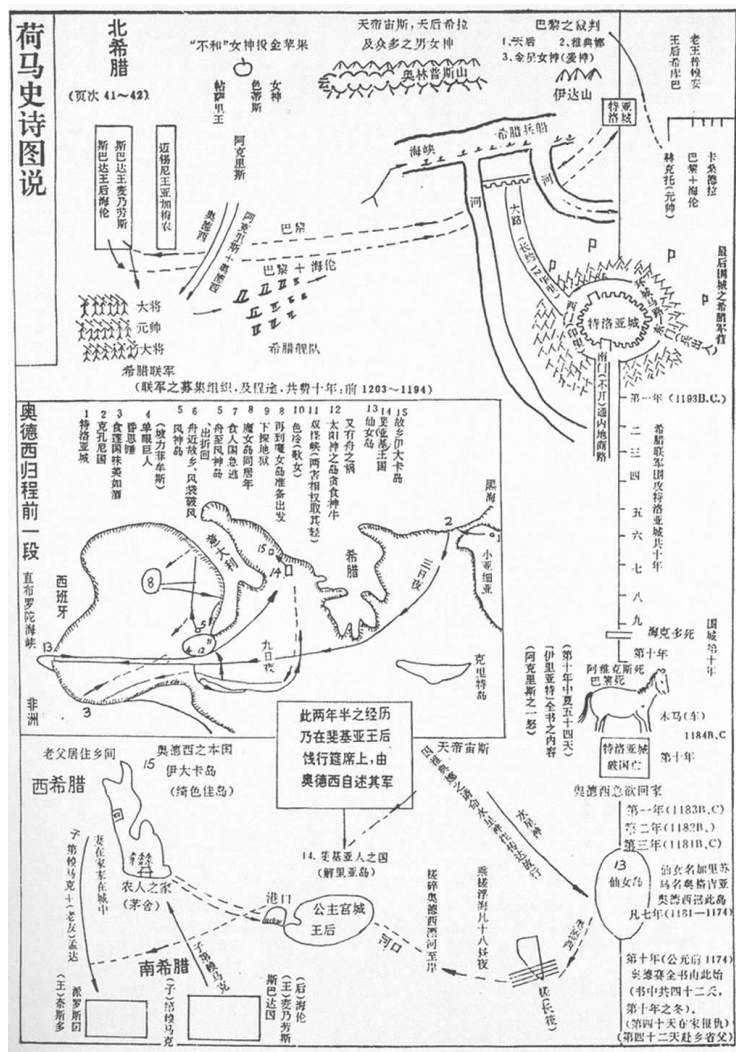
风景是很美的。远眺嘉陵江,江水从观音峡奔涌而去了重庆;近望缙云山,狮子峰高塔入云端。天生桥满长街的古木,雀鸣如歌而不见鸟影。跳过街去,便是西师大校园,看桃园盛开了桃花,果枝挂满了柚或梨,一年四季葱葱郁郁的树,都和那些喜气洋洋的大学生们竟放着同样美丽的梦。

新中国刚建立的那些年,举国人们无不心情舒畅,但到反右斗争时,情形就有些变化了,而变化最大的则莫过于邻居吴宓。

儿时眼中的吴宓爷爷,高大的个子,秃头长衫,壁立腰身,说话如钟,爱食苞谷米稀饭,爱好下棋,然棋品极“差”。他先是教我们下棋,怎样做眼,怎样提子,怎样围空,理论满多的。什么曲靠碰,什么打二还一、金鸡独立……可没两年时间,六七岁的我们竟把他“杀”得大败。于是他开始悔棋了。

“老眼花矣,余改走此着。”他微晃着秃顶,笑眯眯地说。“不行,不行,大大还兴悔棋!”我们按了他的手。“只此一着,只此一着。”他似乎有些急,声音便如撞钟,夹杂着陕北高原土腔普通话,显几分生硬。于是我们让他悔了一着。但此着还是不行,眼看要

输,他猛地耸身站了起来,高如泰山般,声却耳语道:“算吾让尔……”余下的话小儿听不清与真,可后一句却听得真真切切,“我们吃糖果儿。”有了糖的诱惑,我们都不下了,吴宓竟笑得儿童似的,半带狡赖地从衣兜里抓出糖来,(下转第42页)



吴宓 1958 年为所授《外国文学》课程绘制的教学图表¹

¹ 图片来源:《吴宓日记续编(3)》。

我的故居

□文/李秉铎



合作村(现改名为四新村)一舍

我的故居在原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合作村一舍,在那里我度过了我的少年时代。

1950年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定名为西南师范学院。1952年9月底由沙坪坝搬迁到北碚,那时到北碚还没有公路,我们乘民生公司的轮船沿嘉陵江由水路到北碚。搬家那天,天上下着雨,学生们来帮忙搬运行李,那是我第一次坐轮船,沿途烟雨茫茫,江景朦胧,像一幅水墨山水画。最初我家住在北碚新校区驻地——地主庄园(熊家院),平房、木地板,有三大间,两家居住,各住一间半,中间一间一分为二。随后不久修建了合作村新宿舍,我家搬到合作村一舍5号居住。

合作村共六幢,建在上下两个平台上,之间阶梯相连,每个平台三幢,一字排开(这六幢楼后被称为老合作村)。每幢两层楼,八家,分两个单元,每单元四家。房屋建筑是仿照苏联模式:两室一厅,水磨石地,每家有一内阳台,一楼阳台外有一小花台。住房和厨房分开,从住房出门进入公共过道才进入厨房,厨房连有一小房间是保姆房。每套房屋面积大约七八十平

方米,房前有一排高大的苦楝子树,这在20世纪50年代是很高档的住宅了。搬进新房使我们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和姐姐、妹妹、弟弟们在校园内找到一些指甲花、牵牛花、鸡冠花,立刻挖来种在小花台里,感觉离我们憧憬的苏联老大哥的鲜花一样的美好生活更接近了。“苏联人民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那个时代的口号。我们向往的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也快要实现了(这个电话终于在40年后实现了,不过苏联老大哥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已不存在了,我们则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60年过去了,在“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大拆大建中,合作村六幢老房居然屹立不倒,幸存下来,直到今天仍不显得落后,仍有使用价值,足见当年建筑设计的先进和超前。这使得流落在各地的当年住户的子女们还有机会回去瞻仰一番,回忆自己童年、少年的生活。那些斑驳的记忆,有灿烂的阳光,也有不测风云的狂风骤雨。

我家住一舍5号,是楼下。同一单元四家,楼上6号,8号是外语系教师阎童、熊正伦(外语系教授、留美硕士)的住宅。楼下7号,和我家门对门是历史系教师金陶斋家。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在运动中一群书生阶级斗争觉悟大为提高,革命的警惕性越来越敏感,互相之间也产生了不信任和猜疑之心。

1956年春的一天,夜里一两点钟的时候,金陶斋的爱人藏秀英敲我家窗子,把父亲喊醒,让他到金陶斋的房间听一种声音。原来从熊正伦的房间(在金的楼上)传出一种“达、达、达”的声音。藏秀英说以前也听到一次,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听到就向学校人

校史校情

事处反映过，人事处负责人说：“下次再听到这种声音时就把邻居李峻岳叫醒听一听。”父亲听后又到房外巡视了一周，也没发现什么异样，不多时声音停了，父亲便回家睡觉去了。当时父亲觉得不会是发报机的声音，是打字机的声音吧？也不像。打字机的声音比那声音高，且有间歇，不会那样匀称，同时打完一行一定要稍停一下，转一下轴子。是不是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写字台上钢笔写字的声音传到楼下呢？父亲心中疑惑是钢笔划玻璃板的声音：因为合作村一舍的房子没有隔音，楼上的动静，楼下听得非常清晰，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同时熊正伦是个夜猫子，他是夜里读书，夜

里搞工作的。就这样胡思乱想，也未解决问题。第二天因忙于工作，来不及向人事处汇报，只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外语系书记，托她向人事处反映一下。那时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控，特别是互相监控，互相揭发，这一方法在“文革”中发挥到了极至。

戏剧性的是：第二年，革命警惕性很高、积极向组织反映情况的金陶斋和被反映情况的熊正伦都成了右派分子，金陶斋因还有历史问题，处理得比熊正伦还重，他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后来死于峨边劳改农场。金家全家被撵出学校，回原籍山东禹城县。临走前金伯母藏秀英将家里的家具、坛坛罐罐摆在家门口低价出售，以换点钱作路费。那情景非常凄凉，至今仍历历在目。金家的女儿金宝绣是我妹妹的同学，儿子金宝民，金宝祺都比我小好几岁，一同随母亲返回老家农村，以后再也未见过面。我不知道对不懂事的小孩为什么也要这样残酷无情，我们不是对日本鬼子遗留的子女都优待有加吗？二十多年后的1979年，右派平反，风烛残年的藏秀英曾回西南师院落实政策。她找到当年的邻居我的父亲，谈起二十多年来的艰辛，潸然泪下。

合作村一舍1号是教育系高振业教授的住宅，楼上2号是地理系杜子荣教授的住宅。父亲和高伯伯、杜伯伯是多年的老朋友，关系密切，经常来往。

高伯伯个子矮，体胖，杜伯伯个子高，身体挺拔。我常常说高伯伯是矮伯伯，杜伯伯才是高伯伯。高伯伯听了哈哈一笑，一点也不生气。高伯伯为人随和，

合作村一舍最早的住户

房号	单位	住房姓名
一号	教育系	高振业
二号	地理系	杜子荣
三号	中文系	李景白
四号	教育系	张臻一
五号	外语系	李峻岳
六号	外语系	阎童
七号	历史系	金陶斋
八号	外语系	熊正伦

我小时候常去他家玩，长大后在外地工作，每次回家仍去看望他。高伯伯常呼我小时候的外号小名“三犟筋”，称我为“老侄子”，告诉我小时候我做的那些可笑的有趣的事。高伯伯在一舍1号一直住到身体不支被接到成都三子处，1996年去世，在那套房里住了四十多年，是合作村一舍唯一没有挪窝的人。

杜伯伯是山西人，他是教地质学的，时常带学生到野外考察，因此身体强健，走路身板挺直。他的性格和身体一样，直率、刚正不阿。“文革”初期，父亲的老朋友潘仁斋时任副教务长，被作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而揪出来进行批斗。批斗结束，天下着雨，潘伯伯头上扣着一个纸篓，不敢取下来，在雨中踽踽独行。杜伯伯见了，走过去给他打着伞遮雨，又把他头上的纸篓取下。那个时代，敢这样做真有点胆量。1967年重庆的武斗越演越烈，西南师院成了重灾区，潘伯伯一家外出躲武斗，我弟弟秉鉴到文化村一舍帮潘伯伯照看房子。住在文化村一舍106室的中文系老教授吴宓孤独一人，无处可逃。他早已被打成反动文人而揪出来，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杜伯伯专门嘱秉鉴照顾一下吴宓。吴宓在1967年8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晚7时杜子荣导李峻岳之第五子李冰鉴（按：应为李秉鉴）来见并介识。缘李冰鉴将借住本舍104潘仁斋宅中，杜君谓宓若遇急难，可奔至李君处求救援，云云。其意可感。”杜伯伯是一个热心人，“文革”中外语系主任赵维藩教授长期外出，在子女家中躲武斗，由杜伯伯和父亲帮忙领工资取

粮票寄去,赵伯伯感慨地说:“有李杜在,老赵衣食无忧矣!”

现在合作村一舍的住户全部换了新人,走在校

园里也极少能遇见父亲那一辈的老人了,更没有人喊我“老侄子”了。所以心中难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

(编辑 刘润)

(上接第 33 页)女师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形成了开拓进取、探索科学精神和广泛择业的健康心态,其优良的学风和校风给学院所在地带来了清新的文化学术氛围。同时,女师院的创立使江津、重庆地区女学之风兴起,现代女性意识大大增强,社会风气日益开化,尤其是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可以说,女师院的开创与发展,促进了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

女师院从无到有,院系不断得到完善,学院规模逐渐壮大,前辈们超凡的智慧和才华,为国家培养造就了一批批中等女子教育师资,同时也为今天的西南大学作了丰厚的历史积淀。

前世典范,后人楷模;德传百世,名留千秋。女师院教师们的辛勤付出和办学业绩不应遗忘。

参考资料:

[1] 朱世禔手稿:《关于我参加各种组织社团的材料交代》《我在女师学院任教经历》《我所认识的地

下党员一览表》《我的综合检查交代》《我认识的劳君展》。这些手稿均为 1968—1970 年近 3 年间,父亲被隔离审查时撰写的,加上其它材料略有 10 多万字。“文革”后拨乱反正,父亲得以平反,所有手稿全部退还本人。

[2] 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编.九三学社简史[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

[3] 许鹿希、许中明、许进.悠悠岁月 情系中华——劳君展的人生历程[J].民主与科学,1999,(6)。

[4] 张艳华、章慕荣.毛泽东与许德珩夫妇的一段交往[J].党史博采,2001,(2)。

[5] 胡帆.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与夫人劳君展[N].人民政协报,2011-3-30。

[6] 许进.许德珩、劳君展向毛主席赠物一事始末[J].百年潮,2005,(4)。

[7] 彭泳菲.抗战时期江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研究[J].沧桑,2011,(2)。

(编辑 郭兰)

(上接第 35 页)他却因解放初期协助部队弭虫灾、保护军粮而耽误了民主党人重新登记的机会。而后他又忘我地积极地加入到建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的热潮中,成天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根本没有心思去想个人得失。退休后,几十年前的老朋友与他见面,问及待遇,都替他抱不平。封昌远本人却从不提此事,直到晚年他的老朋友(都是我国知名人士)亲笔写证明,他才向民盟写了报告,但由于民盟的资料不全而没有被认可。老朋友们都出主意叫他去查香港的《光明报》及有关民盟史的资料,封昌远都一一婉言谢绝了。他说:“我一辈子为国为民,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多少大是大非,什么都过了,还争什么个人得失哟!”。此事之后,封昌远仍然不顾年事渐高,照样热心助人,经常对有困难的师生解囊相助,自费

下乡为那些遇到病虫害的农民排忧解难,对来信来访的求助者,无论认识与否一律免费接待、亲笔回信。封昌远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当年错误斗争过自己也总是既往不咎、以德报怨、宽大为怀,对于因门户之争贬低过自己的人,他也不计前嫌。在他自己都住牛棚,被监视劳动的境况下,还在关心周围的人。当他看出一个以前的同事有想不通想轻生的念头时,立即用姜子牙的故事来宽慰这个同事。结果被人用“借古讽今”的罪名告密,而遭到毒打。

回顾封昌远的百年人生之路,我们永远怀念他,永远尊敬他,永远学习他!最后,我们以陈毅元帅的一首诗来表达对封昌远的怀念之情: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编辑 李梦露)

高考与我命运的改变

□文/谢德体¹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家中有5个兄弟姐妹。1976年,高中毕业后,我便在家乡的中小学代课。几个哥哥姐姐虽都是初中或高中毕业,但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他们连教书代课的机会都没有。

那时,我们农家孩子都觉得上大学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1972年以后国家开始实行推荐上大学制度,在具体操作过程之中,出现了很多不正之风,如走后门、拉关系等等。哪些人和当地的干部关系比较好,或者说家庭有背景,就可以上大学。反之,如果家庭有一些历史问题,出身不好,那是永远也进不了大学的。因此,这种制度并没有把真正有学问以及真正渴望学习的有志者选拔到大学里继续深造。

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我们都非常兴奋。和很多人一样,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也报了名。从公布考试通告到真正考试,只有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况且我当时正在一个中学代初中三年级的数学课,每天的作业要批改到很晚,根本没有多少时间进行复习。

那年的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政治和理化四门,其中理化是物理和化学的综合。考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发挥得并不理想,因此心里也没抱多大希望,而且考试也不公布成绩,我就渐渐淡忘了这个事儿。

由于通讯不发达,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录取,心里也认定自己与大学已经失之交臂。1978年元旦刚过,按照要求,我带着100多名学生到附近一个寺庙参加劳动锻炼。一天,舅舅跑到寺里通知我去参加高考体检,我十分诧异,也十分兴奋。因为那时能参加体检的人,都是上了录取分数线,所以进大

学很有希望。

我回到县城参加体检,身体没什么问题,接下来就是填报志愿了。那时没有招生简章,公社只用一张白纸,写了一些学校的名字,贴在墙上供大家选择。我便随意填报了西南农学院。

寒假结束,中学陆续开学了,通知书却迟迟没有寄来。学校要求,凡在开学后还没拿到大学通知书的,继续在中学代课,于是我又走上讲台。虽然如此,我依然充满了希望,毕竟我是参加了高考体检的。那段日子,我每天中午都到邮局去问有没有我的通知书。

终于,在1978年的2月28号,我拿到了通知书:西南农学院(1985年更名为西南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土壤农业化学系。

当时县里有3000多人参加考试,上线体检的只有90多人,最终真正进大学的只有30人左右,概率基本上是百分之一。我所在的那个乡,参加体检的有6个人,其余5个都是下乡知青,只有我是回乡知青。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大学,他们几个都进了中等学校。虽然已被录取,但是我对西南农学院还是一无所知。

一天,高中的班主任告诉我:“你这个学校和专业都非常好。”他给我看了几天前的《人民日报》,上面专门报道了西南农学院土壤农业化学系的侯光炯老师。我看了之后,才对这所学校和这个专业有所了解,对侯老也十分敬仰,渴望能够亲眼看到他。

按照通知书上的要求,我3月11号就要到学校报到,仅有十几天的时间做准备。由于还在初中二年

¹ 谢德体,男,汉族,1957年9月生,四川开江人。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知名“三农”专家。荣获“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中国青年科技奖”“农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和侯光炯老师(左二)一起访问农情²(右二为谢德体)

级代物理课,我就让哥哥姐姐帮我办迁移手续。当时公社里有一股不正之风,那些干部掌握了一点权力,就天天揣着公章到处吃喝。母亲说:“我们也请他们吃一顿吧,好给你盖章办手续。”可我坚决反对。我想,我是凭本事考的,凭什么还要请他们?他们不给我办,我就直接去报到。由于我的坚持,迁移手续一直没办下来。后来乡党委书记得知此事,就把那个干部叫去谈话,告诉他在这个事情上,不能卡别人,这是国家的新政策。于是我的迁移手续终于在报到前几天办好了。

3月8号,结束代课的第二天我就打包行李,背着席子、被子出发了。在重庆北碚下了火车,我遇到了学校派来接新生的老师。他们的交通工具是几辆拖拉机,在轰鸣的机器声中我来到了西南农学院。

1978年西南农学院共招收学生600多名,有“老三届”的,有高中毕业一两年的,有没上过高中的,还有工作了好几年的,年龄相差很大,甚至有父子同进大学的。

大家觉得读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都非常努力。比如学习外语,同学们的外语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人进校之后就可以读原版的外文书,而我由于读初、高中的时候,正闹“文化大革命”,英语基本上就停留在只认识26个字母的水平上,仅会的几个成型的外语句子也都是“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因此,我在大学里把很大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外语上面。由于数学功底好,我在一个月内就把大学一年级的数学全部自学完了,然后就在上这些课的时候看起了外语;班上有外语好的,我就天天跟着学;早上锻炼完才6点钟,便开始学起外语……现在,班上的同学,虽然分散在各地,但个个都是部门的业务骨干,这和当时的勤奋与努力是分不开的。

进校后,我就急切盼望着见到侯光炯老师。他很少给我们上课,因此真正见到他的机会比较少。但是从老师、同学的口中,我对侯老师的人生经历、学术思想及研究成果等都有了很大的了解。大学毕业时,国家包分配,根本就不愁就业问题,但是我没有去参加工作,而是考取了侯老的研究生。当时班上有3个人考侯老的研究生,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做了他的

西南农学院学生学籍表												
土地农化系				土地农化专业				入学日期: 七八年三月十一日				
姓名	谢德体	性别	男	个人成份	学生	家庭成份	贫农	民族	汉			
入学年龄	6岁(生于农历)	1957年	9月	籍贯	四川省开江县(市)	水久通讯处	开江金鸡11-7队	修业年限				
学	起	迄	年	月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毕业地	毕业否				
	1963年	9月	起	至	67年	12月	止	开江县城关镇第二小学	四川·开江	来		
	69年	9月	起	至	70年	7月	止	开江县城关镇第二小学	四川·开江	大学毕业		
	71年	3月	起	至	74年	元月	止	开江中学	四川·开江	3.初中毕业		
历	74年	9月	起	至	76年	7月	止	开江中学	四川·开江	2.高中毕业		
	年	月	起	至	年	月	止					
简	起	迄	年	月	所	在	单	位	作	何	工	作
	76年	7月	起	至	77年	5月	止	开江县金鸡公社十一大队九队		务农		
	77年	5月	起	至	77年	7月	止	开江县金鸡公社新建小学		代课		
	77年	9月	起	至	78年	3月	止	开江县开江中学		代课		
历	年	月	起	至	年	月	止					
	年	月	起	至	年	月	止					
是否团员	团员	入党日期	74.1.8	入党地点	开江中学	曾任职务	团支部书记	工资级别		推荐单位	开江金鸡11-7队	
家长姓名	谢之新	称谓	父亲	工作单位及职务	开江金鸡新建小学人民教师	住址	开江县金鸡公社11-7队					
是否结婚		爱人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个人发明创造名称		时间		赶火车起止地点	达县——北碚							
注: 学员只填写正面, 背面不填。												
学号 77750 > 班 051												

西南农学院学生学籍表³

²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22。

³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土壤农化专业1977级学生学籍表,02-教学-1942-1992-272。

校史校情

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我又跟着侯老师读博士。土壤学是西南农学院的第一个博士点,我也是侯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

读研究生的时候,假期我一般不回家,即便回家,待的时间也非常短。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侯老师的实验基地,或者跟着侯老师到全国各地去考察。侯老师对我要求非常严格,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不能偷懒也不能叫人代做。如搞田间实验,栽秧、犁田、做小区、布置实验等。做天气实验时,要在晴天、阴天、雨天连续 72 小时观察地里的情况,我们必须每两个小时光着脚跳入水田里记录数据,几天下来觉都睡不好。这种实验一年要做几次,夏天还好,冬天就非常难受,田里面的水冷冻刺骨。对侯老的这种严格要求,当时我有点不理解,工作之后才发现正是侯老的这种严格要求让我受益匪浅,所以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感激侯老师对我的教育和栽培。

30 多年过去了,每当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心情总是十分激动。正是那场高考,决定性地改变了我

的命运。如果没有那场高考,我很可能就在农村接起父亲的班,当一名民办教师。因为在之前的时间里,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能够走出来,感觉这一切都不现实,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够接班。正是那场高考,让我走了出来,继续学习深造,提升自我,从而有了今天的成就。

我是从事农业工作的,经常有机会到县里给农民讲课、座谈,帮助他们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介绍他们引进一些新的品种。我还自发组织成立了智力支乡联络委员会,并连任了几届会长,帮助区县解决农业上的实际问题。

我想,除了感谢,我应该多为这个社会做些贡献,回报党,回报社会,回报国家,正是有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才有了我发挥才智的机遇,才有了我今天的一切。

(本文转自《缙云春潮——纪念北碚区改革开放 30 周年》一书,内容略有修改。)

(上接第 36 页)一人一颗,一人一句“不多,不多,乐棋,棋乐而已”,然后各自散去。

1957 年反右后,吴宓似乎没到学校上课了,他有很多时间想让我们陪他棋弈。但我们也上了小学,不能陪他了。每当此时,本就没先前和蔼的他,脸上更添了些苦瓜样,我们也就在家长的招呼下,不想也不便与他来往了。接着“三年困难时期”,继而爆发了“文革”,吴宓成了批斗的对象,我们唯恐避之不及,加之自家的出身不好、成分高,谁又还来理会这个孤独的老人呢?

“文革”后期我们下了乡,吴宓离我们实在太遥远,渐渐也就忘却他了。真的,那时的我们竟然不知道吴宓是大大的文学大师。那年月知识分子都叫了

“臭老九”,听说“臭老九”的他被大学生红卫兵断了腿什么的——与我何干,也就随他去吧!

改革开放后,我考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这才知道吴宓的大名,那可是大名鼎鼎、鼎鼎大名,然对他,于我,往事如烟,不过添些谈资罢了。名人也者,不知其名,又不知其学,泯然众生同;既已知其名,又已知其学,众生来附其名与学,试问合适否?

而今我们也到了吴宓当年的年龄,虽教书大半生,却名不见经传,就更无提笔回想之趣了。却不料有西南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刘广生来我校教书,畅谈及吴宓先生,遂促成上述文字,也算是对吴宓老先生在天之灵的一点微薄慰藉,则此足矣!

(编辑 郭兰)

郭沫若手稿今何在

□文/邓力

放假,去了成都。

府南河边,摆起盖碗茶,边喝,边与几位曾经的学生闲谈。

曾经的学生送上几本近作。随手翻翻,不错,作家出版社的。忍不住夸耀几句。学生抿嘴,不无得意:那还消说,桃园泡过的嘛!

“桃园泡过的。”啥意思?大家都能意会。于是,不再说面前的作品,只说桃园。桃园还是老样子吗?桃园前面盆景似的水塘呢?桃园到教工浴室那条灌木丛中的小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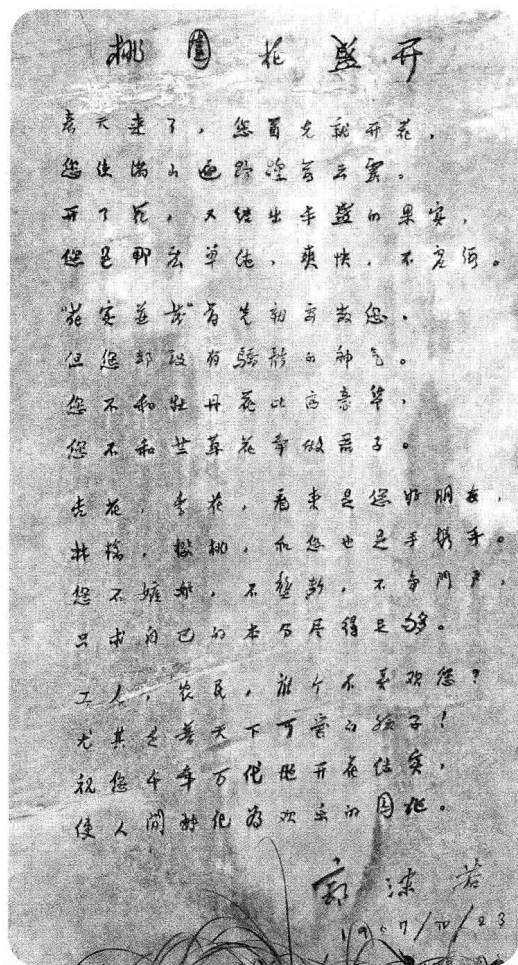
有人思维太跳跃,由此桃园跳到彼“桃园”,问起图书馆前那块诗碑。有人随口吟咏:

桃园花盛开

春天来了,您首先就开花,
您使满山遍野灿若云霞。
开了花,又结出丰盛的果实,
您是那么单纯,爽快,不虚假。
“花实并茂”首先就要数您,
但您却没有骄矜的神气。
您不和牡丹花比赛豪华,
您不和兰草花争做君子。
杏花,李花,看来是您好朋友,
林檎,樱桃,和您也是手携手。
您不嫉妒,不垄断,不争门户,
只求自己的本分尽得足够。
工人,农民,谁个不喜欢您?
尤其是普天下可爱的孩子!
祝您千年万代地开花结实,
使人间转化为欢乐的园地。

都知道,这是郭沫若先生写的《桃园花盛开》,刻在北区图书馆石阶一侧。学生说,第一次去图书馆,见了那诗,惊讶于作者的鼎鼎大名,惊讶于鼎鼎大名

的那人竟会为了一本尚在孕育的校园读物题诗。后来又一次次经过,终于在大学四年的某个时候,将斑驳的说法连缀成了整齐的记忆。说的是1956年4月,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空前繁荣,中文系学生准备创办一本属于自己的文学杂志。杂志取名《桃园》。《桃园》创刊,想请些社会名流鼓励鼓励。中文系的小牛犊们拟了一份让老师吃惊的名单。好家伙,铃儿响叮铛,(下转第55页)



西南大学北区图书馆石阶一侧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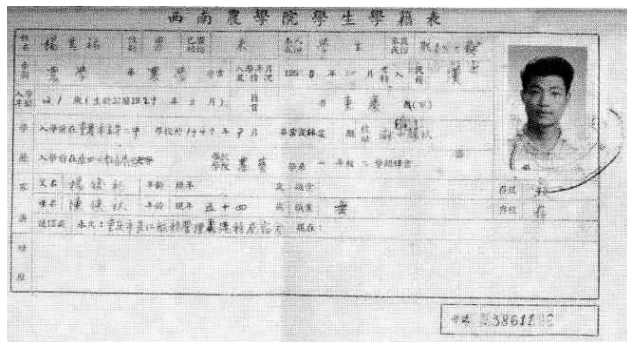
“我俩唱一首歌”

——吴明珠院士谈丈夫杨其祐校友

(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编者按：人们知道，吴明珠院士毕业于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是西南大学人的骄傲，但是知道杨其祐名字的人却不多。吴明珠与杨都曾经是西南农学院园艺系的学生，是我们的校友，更是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妇。1999年，吴明珠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曾对媒体谈及自己的丈夫杨其祐，情深深，意拳拳，感人肺腑。其时，杨其祐已离开人世……《西南大学记忆》刊发此文，以怀念我们这位可亲可敬的校友。

杨其祐和我是大学同学。他很有才华，待人诚恳，我们同学四年，感情一直很好。后来，他做了北京农业大学小麦专家蔡旭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他也来到新疆，在新疆大学任教。



杨其祐的学生学籍表¹

1958年春节，我在县政府向同事借了间房，就和杨其祐结婚了。当时什么也没有，窗帘、桌布都是借的，我们只买了五十块钱的糖。那天晚上，我们又唱又闹，可热闹啦。他二胡拉得很好，在学校时，总是他拉二胡我唱歌儿。结婚那天晚上，他还高兴地唱了一首“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他唱得那么高兴，唱得那么好，我真是永远也忘不了啊……

后来，新疆大学和八一农学院合并时，他申请来到我们鄯善县农技站，从此，我们一直在一起生活。

在50年代，研究生可谓凤毛麟角，珍贵的人才。他能来到鄯善县农技站这个小庙里来工作，是很难得的。他知识渊博，英文、俄文都很好，人们传颂着，他是全新疆农技站中学历最高的，什么事不懂，只要问他，全能说明白。大家给他取了个美名叫杨洋博士。杨博士来到农技站，帮着搞小麦品种改良、修水渠、搞食用菌，改革开放后，还教大家学英语，很受大家欢迎。

他特别爱看书，他的钱都买了书。对吃穿，他全不在意。因为我经常下基层，不能照顾他的生活，他塑料凉鞋鞋带断了，就用根绳子系上；棉被洗了没缝，他就盖棉絮过夜。当时生活很困难，饿了，他常常冲点苞米花当顿饭，喝点酱油汤当菜……许多人惋惜地说，他如果生活上在意一些，也不会把胃搞得那么坏，后来也不会得癌症啊！都怪我老是下乡，没能照顾好他。

他对我是挺照顾的。我下乡，他炒上咸菜，托人捎给我。那时，生活比较困难，他老是把好东西留给我吃，常常把面条擀出来，晾干，等我回去就下面吃。他对我的工作特别支持。他很用功，看的书多，外文又好，看到学术刊物上有关的资料就给我抄录下来，翻译出来。他帮我出点子，买有关的书。有时，我因为一些事分不开身，就打电话让他帮我去授粉，做杂

¹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教学-137。

西南农学院欢送参干同学留影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五

西南农学院欢送参干同学留影(第四排右一为杨其祐)²

交,有时要跑七八十里,他也不说二话……

后来,他身体坏极了,还要坚持工作。1981年在重庆出差时,胃癌突然发作,当时就做了手术,医生说最多只能活三四年。到1985年底,他的胃癌又转移了,我想了很多很多办法都无济于事,到1986年4月,就起不来床了。我天天在医院陪着他,他一会儿也不愿离开我。女儿刚替换一会儿,他就说去叫你妈妈来……就是这样,他还要支持我的工作。他劝我:“你那儿工作放心不下,能回去一下,就回去吧,回去了再来嘛……”我怎么能走呢!

有一天,他笑眯眯地用手指比划个“三”给我。我问他,这是啥意思?他风趣地说:“三连冠嘛!”我恍然大悟,原来指我育出的三个优良品种“含笑”“火洲一号”“伊选”。我说:“我的成果,一半都是你的。”他笑了。在中国,一个女科技工作者要想干一番事业,没有丈夫的支持是很难成功的。何况在新疆那样艰苦的条件下。

我总觉得他这一辈子,我没照顾好他。在最后的时刻,想把自己遗憾的事对他讲出来。他总是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

“我……没照顾好……你……”
“我憋不住,终于说出了心中的悔恨。”

“两人在一起生活,说不上谁照顾谁,互相照顾嘛……”

听到他这句话,我如释重负,多少年的内疚一下全解除了。

他知道我工作起来什么都不顾,弥留之际总是叮嘱我:“你要好好休息,好好吃饭。”他知道,自己再不能照顾我了……他不放心的,还有两个孩子大学还没毕业,经济上的负担还很重。事业和家庭的重负,全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了……

我问他:“你因为我到新疆来,没能发挥你的才能,你不后悔吗?”他说:“我无怨无悔。”

听了他的回答,我非常感动。一个50年代的研究生,到新疆这样艰苦的小单位来,为边疆人民播撒知识,播撒科学,献出了青春,献出了汗水,献出了生命。临终时,既没有官衔,也没有职称,年仅57岁……

临终那天晚上,我走到他身边,儿子正在照护他。我对儿子说:“让我给你爸爸洗最后一次脸吧!”

他本来已经停止了呼吸,听见我的声音,眼睛突然睁开了……儿子抹都抹不下去……他不想死……他舍不得离开我,舍不得离开孩子们,舍不得离开他养他的土地……他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他多想活着啊……

火化五天后,我便回新疆农科院,很快就到海南岛我们的基地干我的工作去了。从那以后,我更加勤奋工作,每年搞三季育种,吐鲁番——海南岛两头跑。我觉得,我一个人应该做我们两个人的工作才对得起他,对得起热爱我们的新疆人民。我不停地工作着,不愿意回家。忙起来,我就把什么都忘了……

²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侯光炯到川农讲学与考察

□文/张晓华

编者按：侯光炯是我国著名土壤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一生致力于创建和发展土壤科学理论，是我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也是我校著名的学术大师。侯光炯长期从事土壤地理、土壤分类和土壤肥力的研究及教学工作，治学严谨，勤奋敬业。下面这组图片记录了他1960年7月到四川农学院进行短期讲学和考察的情景，充分反映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



与四川农学院土壤农化教研组老师合影留念（后排右三为侯光炯）

1960年7月底，侯光炯到四川农学院进行短期讲学和考察，受到四川农学院农化教研组师生的热烈欢迎。



四川农学院土化组开欢迎会

一、室内讲学。侯光炯的课深入浅出,既有宏观的讲述,也有微观的分析,同学们被他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深深的吸引了。



认真地进行课堂讲学



与教研组座谈(左边正在发言者为侯光炯)

二、室内讲学结束后,侯光炯与川农老师一起深入邛崃低产田找低产的原因。在 1958 年全国土壤普查中,侯光炯总结出了一套“望闻问切”的辨识土壤的方法。“望”,即对宏观环境的综合观察和分析。“闻”,就是听当地有关部门对该地农村经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状况的介绍。“问”,即农情访问。“切”,即拣土壤剖面进行科学观察与诊断。在这次考察中,他也应用了这个科学方法。



现场观察环境

望



到田地中查看



闻

向公社党委书记了解低产原因



问

访问农情



倾听老农的意见



测量土温

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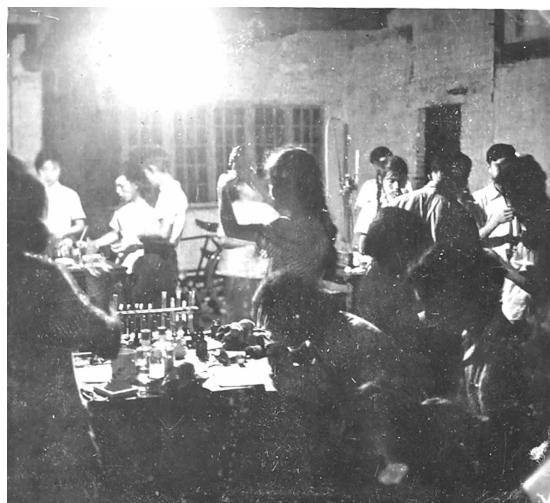


打钻



与教师共同研究低产田

三、考察结束后,进行分析总结,找低产的原因。



集体挑灯夜战



大家一起找原因



热烈讨论

在短短几天的讲学和考察中,侯光炯给四川农学院土壤农化系教研组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将侯光炯讲学和考察时的照片专门做了一本影集以示留念,而他们将永远记住侯光炯老师的教导:“永不满足,不断革命,大力改造土壤科学,使之永远为农业生产服务。”

“留法数学四老”中的段调元、郭坚白

□文/邓力

在中国近现代数学启蒙教育的名师之中，有一个圈内耳熟能详的称谓：“留法数学四老”。这“留法数学四老”指二十世纪初，前往法国攻读数学的四位留学生：熊庆来、何鲁、段调元、郭坚白。“四老”中的段调元、郭坚白，后来先后来到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任教，在缙云山下的这个人民教师的摇篮里圆着他们“教育救国”的梦。

在回顾他们的留法经历时，两位当年的留法同窗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曾经的那一群血气方刚、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他们互相帮助，相互扶持，一同为着“教育救国梦”而奋斗着。如段调元在填写履历表时，在“介绍主要社会关系”一栏，还不忘郑重其事地写上吴玉章、聂荣臻等人的名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相互关系”一栏里作如此表述：在思想上得到他们的启蒙。

1912年初，吴玉章等人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活动，鼓励青年人赴法留学，从而达到“输世界文明于国内”的目的。留法俭学会的成员中，不少学数学的年轻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法国，段调元、郭坚白即是其中的两位。在他们看来，法国不仅是“民气民智先进一国”，也是数学名家辈出的国家和世界数学的中心。经过近半年的法语补习，段调元、郭坚白等踏上了前往法国的海轮，成为我国第一批赴法攻读数学专业的留学生。

出国之前的段调元，最初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尤好梁公的《饮冰室文集》，熟识《变法通议》《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梁氏名篇内容。对于取自《庄子·人间世》之“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的“饮冰”一词的含义段调元显然非常了解，但他自己内心之忧虑何为，观其行为便可知其一二。还在成都通省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段调元就参加了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活

动”，鼓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这些“大逆不道”的行为不为学校所容忍，于是他在校被开除了学籍，“满清”提学使还为此通令其他学校不得招收段调元续读。为完成学业，段调元不得不乔妆并改名段绍农，进入法政学校继续学习。所幸的是没过多久清廷被推翻，段调元才得以改回原名。在发现梁启超的理论救不了积贫积弱的中国之后，段调元想到欧洲留学，希望“科学救国”，而法国正是他想去的理想之国。

段调元在法国里昂大学就读，这是一所集文、理、工、法、医等学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学，他在这里用三年时间完成规定的学分获得理学硕士学位。1920年段调元回到中国。此时的中国正是近代高等数学教育的发轫时期，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相继设立了数学系，我国开始自己培养高水平的数学人才。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从法国求学归来的段调元，从此将一生投入到“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实践中。

段调元先后任教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与“留法数学四老”中的另一“老”——何鲁曾交替担任过重庆大学的教务长、理学院院长。

与初次出国的段调元不同，郭坚白已是第二次出国。郭出身于一个地主大家庭，十岁那年就曾随父母去过日本，回国后又进了成都叙属中学读留学预备班，开始为出国留学做准备。活跃在清朝的郭家主人，比一般人更能清楚地看到清廷的腐败和国势的衰弱，因此郭父早年参加了以推翻满清为宗旨的同盟会。父亲的经历对郭坚白的影响是深刻的。辛亥年间，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过不到半月，16岁的他就加入了武昌的学生军，满腔热情地投身到那场伟大的革命中，然而，等来的却是袁世凯的复辟，看到的却是一些曾经高喊共和万岁的人的趋炎附势。青年郭

坚白对政治产生鄙夷和厌恶心理，他想希望通过科学技术来救国济民。于是，他选择去了法国。当他从法国巴黎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后，又进入法国朗西矿冶学院学采矿工程3年。1923年春天，郭坚白回到祖国，本想以所学之采矿工程技术报国，却没能如他所愿，于是同留法数学四老中的其他三位一样，走上了教育报国的道路。郭先后在安徽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中国公学、重庆大学任教。1950年来到刚刚组建的西南师范学院，担任数学系的首任系主任。

“留法数学四老”中的二位——段调元与郭坚白，与西南大学的关系最早缔结于上世纪40年代，他们均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兼职教授，1950年代初，又双双际会于西南师范学院，又在同一个系开始了他们的教书生活，直到去世。

段调元、郭坚白是中国近现代数学教育界的知名教授。段调元长期从事古算和数学史的研究，从法国归来的前几年，热心于国外数学著作的翻译，所译

著作成为我国近现代数学启蒙教育的重要读物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微分学》。他还参加了我国第一部数学辞典——《算学大辞典》的编纂工作。郭坚白精通微积分、实变函数、复变函数等一些当时被认为新兴的数学学科，对中国古算法也非常了解。晚年的郭坚白对易经中的数学问题产生浓厚兴趣。他认为以二进位记数的易卦富有深刻的数学道理，从中可以窥见我国数学在周代的发达程度；挖掘易经中的数学问题并发扬光大，不仅可以破除我们对于易经的迷信，还可以增加我们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为此，郭坚白还专门撰写有关易经卦爻的文章，可惜没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出版。

不过人们不会忘记，段调元、郭坚白以及不在西南大学的何鲁、熊庆来；不会忘记被尊称为近代中国数学史上的“留法数学四老”；不会忘记他们为我国培养了大量杰出的数学人才，为发展我国近现代数学学科，做出巨大的贡献。

（上接第20页）张充和在耶鲁教中国的昆曲和汉字书法，傅汉思是耶鲁著名的德籍汉学家。记得方敬老师还告诉我说：“当年我和卞之琳在北大念书时，张充和女士在当时是有名的才女。”在我的汇报结束时，方敬老师对我说：“你从耶鲁归来，我送你一本1917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详注本的莎剧《King Lear》。是我从前在北京一家旧书店买的。”他送给我的这本绝版书我都一直珍藏着。1992年1月，他亲笔签名送给我一本他和何大姐合著的《何其芳散记》；1992年11月，他又签名赐赠我一册《方敬选集》。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有人邀我翻译当时英美出版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流行小说。那人对我说，只管译完，不用校对，交书稿时就付稿酬，而且稿酬不低，但我婉言谢绝了。后来我对方敬老师谈到此事，他当时对我说：“我们翻译东西，总得应该是对人民有益的。”我永远都记着他这一教导。

我受方敬老师的关怀和教诲，实在太多太

多。对我来说，作为晚辈和学生，我特别要向他学习，永远不忘当年他对我的诸多教诲。在纪念方敬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不禁想起他1991年8月发表在《文学翻译报》上的一首诗，更难得的是方敬老师自己把它译成了英文：

梦

我已悄悄地走了
你正熟睡地睡去
好好地梦着吧
我不愿从你梦里远离
久久地我才回来了
你已远远地离去
愿好好地做着梦
在梦里等待着您

A Dream

Silently I depart
When you are fast asleep
You dream a long long dream
Where in I would fain keep
Long after I am back
And far away are you
I would dream a sweet dream
Where in I await you

在此，我借用当年他缅怀何其芳同志时说过的一句话，来表达我内心的情感：“缅怀其人，珍视其诗文！”

（编辑 张晓华）

论校史档案管理的价值所在

□文/王玲

一、校史档案及其管理的相关问题

1.关于“什么是档案”,笔者从各类刊物、文献记载当中找到了一些,说法不一,综观各种关于“档案”概念的规定,笔者认为它是一种以文字、图形声像或实物形式保存在一定场所的,对于某机构、组织或者个人在某段时期或相关事件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历史资料。可称之为“档案”的事物应该具备以下几点特征:第一、“档案”是指向一定机构、组织或者个人的,机构和组织可以是国家、省市或县乡村等各级,也可以是其他的各类独立机构;第二、“档案”必须是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记录着某机构、组织或者个人的重要信息,甚至是各级各类机密;第三、可被称为“档案”的事物,其具体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一般以文字和声像资料居多,但也可以是实物形式的或者其他形式的;第四、“档案”的时间持续问题,一般包括短期、中期或长期有效的关于某机构、组织或者个人的记录,某些较为特殊的“档案”由于政治、经济或其他原因,多由于保密的需要而存在“解密”或长期封存等不同的处理方式,也有的视其影响被限定于一定时期内传阅;第五、“档案”的使用范围也可根据其影响力大小而定,它们的保存、维护或检索存在不同的各级各类权限或级别。

2.关于“校史档案”。笔者根据以上对于“档案”概念的分析,认为“校史档案”可以具备以下一些特征:第一、“校史档案”是直接指向“学校”机构的,或者说,它是关于“学校”——这个组织的资料的记录,而不是指向其他的企事业单位,而且学校本身可以是国家、省市或县乡村等各级管辖之下的不同级别的机构,“校史档案”本身的归属、约束范围等也将不同,虽然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第二、“档案”必须是

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信息记录,“校史档案”也就可以理解为对于某学校的历史有关的信息记录,而且这些与学校相关的历史记录是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第三、“校史档案”的记录载体可以是文字、声像的,也可以是实物的,但这些不同的记录形式必须是一定学校历史的载体;第四、这些“校史档案”视其具体学校发展时间的长短或学校组织的存在情况又可分为短期、中期或长期;第五、“校史档案”的使用范围一般较为宽泛,可以是校内,也可以是一定区域的行政机构或文化团体等。

3.关于“校史档案”的管理问题。“档案管理”是对所涉及档案信息的收集整理、保管维护、鉴定统计和提供检索利用等活动的总称。“档案管理”也是一项服务性的工作,对其进行整理归类、保存统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便于对其价值进行有效地利用。“校史档案”的管理,是以学校为单位,专门人员对与学校历史相关的文字、影像、声音和实物等记录载体进行收集整理、保管维护、鉴定统计,以便于相关组织或个人在需要时对其检索、利用,最终实现其应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对于“校史档案”的管理一般有以下一些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学校历史承载物的收集、整理、保管维护等工作的完成必须保证其“数量”与“质量”。“数量”的方面,尽一切的努力,对学校发展的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资料(包括以各种形式记录的)都必须完善,有大框架的也有详细记录各细节的,不能出现“断码”现象;“质量”的方面,信息载体所记录的内容真实客观,详尽而充实,至少不能出现“缺张少页”的现象。第二、在信息载体的检索和使用方面,检索手段多元化,特别是对现代数字技术的合理有效利用,在不妨碍“校史档案”信息安全和持续再利用的前提之下,充分挖掘其价值所在,通过对“校史档案”的研究和展示,真正起到对学校历史深

刻认识的目的,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

二、校史档案管理的价值

对“校史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维护和鉴定统计,包括提供检索利用等活动究竟可以产生哪些价值是笔者接下来要着重研究的课题,研究时笔者采用由表及里、从本体到外延的发散性思路进行。对“校史档案”管理的价值,笔者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料记录价值。一般通过文字、图片等形式将与该学校相关的发展历程记录下来,包括何时建校,何时进行了学校的合并或分校,重大的校园事件,上级单位的领导视察情况,学校从成立以来至“校史档案”编撰时取得的主要成就和贡献,学校的教职工数量及增减划分情况,在校学生的数量及年级分布情况,学校的办学方向,核心价值等。一般来说,“资料记录”采用“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相结合的方式去看待学校历史的,这些也是任何历史所必备且惯用的组织方式,这种“校史档案”具备了一种“纯记录”模式,其特点和优势包括:一是客观详尽。这种资料搜集的方式几乎可以将学校发展的一切点滴都收入囊中,以“时间”为基本的线索,包括每一年每个班每位学生的每科成绩,每年都发生过的细节事件,也包括暑期培训活动中,对每位教师的发展成长情况的平铺直叙,等等。二是一种基础性的价值。之所以大部分的“校史档案”在编撰时都采用此种方式,正是因为它真实、客观、详尽等特点,看似“笨拙”但事实证明十分有效,它可以按照“时间”、“地点”等最基本的线索进行无限的“填充式”的资料记录和整理。三是待开发的价值。这种资料基本可相当于是一种“素材搜集”,为其它方式的记录和整理提供了前提,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其它可能的价值的开发和利用,它仅是一个有效的基础。这种“校史档案”的管理方式也更接近于最为初级的“档案管理”的一般概念——从收集整理到保管维护,从鉴定统计到检索利用,同时这种侧重于“搜集、存储”的管理方式所能体现出的价值也是十分有限的。

第二,研究规划价值。从学校的长远发展来看,学校走过的路程,学校的点点滴滴都是未来的珍贵

财富,为不断地进行反思、比对提供了详实的数据,没有这些数据作为参照,学校未来的规划和发展以及所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纸上谈兵,这种重要的参考价值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校史去完成。另外,“校史档案”需要具备一种“纯记录”模式的感性面貌,从感性的资料出发,对其进行某种理性的抽象,可以发现学校发展当中的某些规律,通过这些趋势概括成为图表、固定曲线,参照时代精神来进行未来规划。这种管理方式以应用为主,一般将研究范围只限于校方内部进行,是主要着眼于学校未来发展的目的驱动下的价值体现,这种管理带有较强的“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色彩。

第三,教育勉励价值。从统计学的角度,校史可能仅仅代表一种感性数据,一种已经存在的历史,代表学校过去走过的历程。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其他的角度去看待这些资料,如某些过去取得的辉煌成就,某些学校教育下成就卓越的人和集体,他们可以成为一种“榜样”,激励着后来人迎头赶上再创辉煌。况且,学校“档案”一般不会只是单面的,而是多样的和客观真实的,既有与学校大的发展方向相关的正面教材,也有反面教材,学校在怎样的情况下对某某个人、集体的不当行为做出判断并纠正,使其步人正轨,这也不失为教育的一种成功之举。这种关于“校史档案”的管理带有“内部升华”的色彩,是一种“校史档案”应用的高层次性的体现,虽然多数只是在学校内部展开,但更为接近于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意义。“……教育的本质特征,说到底,就是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做培养人的工作……”

第四,文化价值。在十七大“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的倡导下,学校及行业同样需要一种核心精神的塑造和价值体系的形成,校园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基地,也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氛围。“校史档案”可以扮演校园文化的见证者和传播者的角色,通过学校历史的沉淀和延伸,向着“清华”、“北大”那样的学术及文化品牌看齐,使学生向时代精神靠近,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未来世界的文化大国和文化强国。这种“校史档案”的管理方式更希望通过历史的沉淀去“借尸还魂”,通过资料本身的延伸去实现新的价值。

第五,收藏价值。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

一些“校史档案”馆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历史博物馆,尤其是其中的某些实物,从某个层面上见证了我国的某段辉煌或满目疮痍的屈辱,具有相当的历史和收藏价值。可以通过对该“校史档案”馆部分藏品的文字或图片说明,去指出或旁证某段历史的存在性,而且有些实物或文献资料属于孤品,是不可复制的独有的珍贵文物,作品本身的价值在不断加大,成为了“校史档案”馆的镇馆之宝。

第六,文献价值。学校所培养的某些著名的校友、国际知名学者及教育家等,在他们经过多年辛勤努力之后获得了所在领域的卓越成就,“校史档案”馆有幸将其捐赠的著作、论文的原稿资料或曾经的作品收于馆内,这些资料本身的文献价值是值得考究的,某项重要的学术论断由此而来,某项重要的科学成就可以在此找到确实的依据,其重要的考证价值,作为有力见证,它们“参看并说明”的作用也会有所体现。

第七,社会影响价值。“校史档案”馆的影响不仅限于校内,随着学校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校史档案”的教育功能可以延伸至社会周边的各个层面,各个个人群,其教育意义和价值将不止步于学校教育本身。

总之,就目前来讲,对“校史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维护和鉴定统计、检索利用等管理活动可以体现出其资料记录、研究规划、教育勉励、文化、收藏、文献、社会影响等多方面的价值,并且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研究进一步挖掘它潜在的其他价值。

参考文献

- [1] 黄济.教育哲学(第一版)[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 [2] 陈智为.档案食理学(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3] 陈兆祺.档案管理学基础[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4] 王传宇,张斌.科技档案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5] 王向明.档案管理学原理[M].上海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9。
- [6] 罗军.中国档案管理体制改革研究[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本文转自《兰台世界》2012年第20期)

(上接第43页)个个钉铛响,其中一位便是郭沫若先生,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著名文学家、史学家。

能否如愿,试试看。

过了一周多的时间,同学们收到了一封航空邮件,由中国科学院院长办公室寄来。

一阵手忙脚乱,迫不及待地拆开。大家眼前一亮,不但看到了郭老亲笔为《桃园》杂志题写的刊名,还看到了郭老的赠诗《桃园花盛开》。《桃园》含义隽永,语意双关,“桃园”中人彻夜难眠。一遍遍读《桃园》后,又有了惊人发现:笔意豪放、苍劲有力的《桃园花盛开》,用的竟然是批阅公文的红墨水。先是不解,继而大悟:一定是日理万机的郭老,在紧张繁忙的公务中,挤出时间来满足了大家的渴望!

这在今天,行么?显然不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一个时代的风气让一种可能存在。

不想离题太远。举起盖碗,以茶代酒敬过,曾经

的学生一声拜托,请老师帮忙的事儿来啦。

老师,《桃园花盛开》真迹是否还在?有没有可能让我们亲眼见见?

真迹?不就是手稿么!是呵,欣赏郭老真迹,欣赏风靡书坛的“郭体”风采,何等幸事,岂不快哉!

我让学生扫兴了。我说,在校三十年,从未见过手稿。跑过档案馆,问过中文系,也曾访问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师生,《桃园花盛开》的手稿,哎!泥牛入海。

沮丧,牵着沉默在盖碗茶旁边蹒跚。好一会儿,才有人发话:何不借助媒体,发动大家回忆回忆,动员大家都来找找,尤其是当年的那些校友,提供点线索也好。果能找到,善莫大焉。

我说,好。

为此,有了这篇文章;为此事,请大家相互转告。

(请知情者与西南大学校友办或档案馆联系)

西南大学

关于征集校史资料和实物的通知

全校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及家属,广大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

为进一步弘扬西南大学精神,更好地挖掘、搜集宝贵的校史资源,丰富校史馆藏品,推动校史研究,特向大家广泛征集西南大学校史资料和实物。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1906年川东师范学堂成立以来,学校在各个发展时期所形成的相关资料及实物。

二、征集内容

(一)上级领导、重要来宾、知名人士、杰出校友来校视察、参观、访问或讲演的相关资料。

(二)学校历任党政领导、知名教授的任命书、聘任书、论著、信函、手稿及在校期间使用过的有纪念意义的实物。

(三)涉及学校历史变迁的牌匾、碑刻(文)、拓片、文件、出版物、印刷品、纪念册(封)、徽标、印章、袖章等。

(四)校内各类重大活动、对外交流合作重大活动的相关资料。

(五)具有时代特征和代表性的教具。

(六)有关教学、科研、文体活动、生产实习的照片和实物资料以及师生员工在校期间使用过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相关证件。

(七)国内外机构、海内外各界人士、校友捐资助学的资料、照片等。

(八)能够反映学校历史变迁的其它资料和实物。

三、征集方式

(一)捐赠。凡捐赠校史资料或实物者,学校将颁发捐赠证书以志纪念。

(二)借展。在持有者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借用展示的方式弥补校史资料的缺失。

(三)代管。对珍贵的校史资料或实物,学校可代为保管(双方签订保管协议)。

(四)复制。通过复制方式获得校史资料的呈现。

(五)转让。对珍贵的校史资料或实物,在持有者自愿、双方协商的基础上,学校可以合理价格进行购买。

四、征集时间

2014年5月1日~12月31日止。

五、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西南大学档案馆、校史博物馆

联系人:郭兰、刘润、张晓华

联系电话:023-68250107

E-mail:xndxsg@126.com

特此通知。

西南大学

2014年5月12日